

唐三藏法玄奘年譜自序

奘公出國以及世壽年月，官修槐撰諸書，多有異議。迨梁任公從新唐書薛延陀傳考查出葉護可汗卒於唐貞觀二年，而後奘以於貞觀元年開始西行乃成不易之定論。任公且自嘆其求證之難。

劉汝霖氏著玄奘年譜，發表於北女師大師術季刊（民國十九至二十年），抗日戰爭中，余曾携之往昆明城，適遭轟炸，此年譜遂與群書盡失。勝利後，不聞有單行本流通，亦未聞女師大校中尚保存有此季刊否也。

近幾年前，虛雲老和尚年譜問世，稱為「自述」，原是不當；其原始記錄人當不能勝於鼂錯之受尙書，以意而錄之者當亦不下於「凡十二三」；胡適首起攻擊，於是聚訟不已。余思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言，更又思劉著玄奘年譜之遺失而未見流通，乃決心擷擇最近資料，重自寫之。並引證古今書籍之難免錯誤，先寫前言一章，欲以息其無聊之諍。老實說：余今七十二歲，使余自述抗日戰爭以前自身經歷事，已如隔世，不自知其真實年月或事件先後矣。脫稿後，加寫後記一章，即送「今佛刊」分期刊出，此又已五年前事矣。

近月來，又思及此奘公年譜稿，遂檢出並加改定，付印單行小冊；及見校樣，始恍然而知此類單行本不見流通之故，蓋全稿字數太少，印成小冊，似嫌太薄。即劉著譜之僅僅埋沒於雜誌中者，實亦以此故也歟？雖然，為大眾研究史地者多備一格計，薄亦無害其為奘公年譜也。

校讐後，乃識其因由如此。

民國五十四年季春，一玄唐曜自序。

唐三藏法師玄奘年譜

一、前言

校玄奘為唐初特異高僧，記其一生史實者，除劉軻所撰塔銘及舊唐書外，（新唐書無玄奘傳，）計有大唐西域記（玄奘譯述辯機記贊張說製序）沙門玄奘上表記（玄奘自撰）三藏法師行狀（唐冥詳撰）續高僧傳（唐道宣律師撰卷第四）三藏法師傳（唐慧立本彥棕箋）唐玄奘法師年譜（劉汝霖著民國十九至二十年）玄奘三藏（日本前嶋信次著昭和二十八年第四版）七種，今六書俱存而獨缺年譜之流通。年譜與行狀或傳體例不同，儘可以有史遷班氏之文，而不易安排其年譜。上列六書，雖於玄奘之事蹟記述已詳，然而諸文互有異同，年月甚多錯誤，如僅僅按語照填按文照錄，則真不必多此年譜之介紹矣。

私人史實之最原始資料，當然直接間接得之於其人之自述或同時人之代轉

述。在此一述一轉之間，口誤耳誤傳誤筆誤均是尋常事，可能訛至判若雲泥。倘若老耄高年，又若傷病劇重，耳聾目瞶之時，口音不清，筆受無術，縱欲質正而亦無從矣。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敢贊一辭；而孔門傳經，首推子夏。春秋三傳，公羊穀梁左氏皆出於子夏之門，而所記不同，所論又不同。其傳授者之異歟？其述學者之異歟？所謂親承警效·師承有自者·猶不免有所訛誤歟？

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直至顏李，始知仁字即人字。大學首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直至程朱而始知親作新，更至陸王而始知親仍作親。其歷代師承傳述之誤歟？其後世之標新立異之誤歟？將誰與正之！

史記袁盎鼂列傳第四十一：『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尙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尙書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其伏勝所述之誤歟？其伏女傳言之誤歟？其鼂錯今文之誤歟？將誰與證之！

毘奈耶雜事（唐義淨譯）卷第四十：『阿難陀與諸苾芻在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若人壽百歲，不見水白鶴，不如一日生，得見水白鶴。」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語：若人壽百歲，不了於生滅，不如一日生，得了於生滅。」……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阿難陀老闍，無力能憶持，出言多忘失，未必可依信，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陀覆來聽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悉以師語白尊者知。尊者聞已，作如是念：「今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欲如何！」……乃傷歎曰：「尊宿已過去，新者不齊行，寂慮我一身，猶如□中鳥；過去親皆散，知識亦隨亡，於諸知識中，無過宅中念；所有世間燈，明照除眾闇，能破愚癡惑，此等亦皆無；所化者無邊，能導者但一，如野孤制底，殘林唯一樹。」』（見影印大正藏精裝第二十四冊律部一四五一部第四〇九頁下格至四一〇頁上格）在阿難生前已有傳述訛誤難於糾正之歎，況至後世乎！

以上四段所引，皆所以說明：無論自述轉述，無論親承教授或展轉流傳，並皆有錯誤之可能。故歷代版本。總難免於脫落錯衍·未經筆削，校讐疏漏·魯魚亥豕。欲求殺青問世而絕無錯誤，真非易事也。

筆者寫此一年譜，一則以補年譜未見流通之憾而爲玄奘史實多備一格，一則一欲親嘗寫譜甘苦，看脫稿後尙遺有幾多錯誤之可議否也。爰以西域記上表記行狀及續僧傳爲主，以校三藏法師傳之錯誤，並參照日文玄奘三藏以推定年歲。現時六書具存，不妨覆按。俗有小說西遊記及西遊記曲本，又有唐僧取經唐三藏救母等戲劇電影，皆係無中生有，絕非史實。前嶋信次氏自稱其所著之玄奘三藏一書爲史實西遊記，蓋明示小說戲曲等等之不足信據也。亦願見及此譜者知之！

二、年 譜

隋高祖仁壽二年壬戌（西元六〇二年），一歲。

玄奘誕生之年，有種種不同之說：①有謂隋文帝（即高祖）開皇十六年丙辰（西元五九六年）者，此係據劉軻所撰「塔銘」之六十九歲說，而今代羅香林先生之「考證」堅主之。②有謂開皇二十年庚申（西元六〇〇年）者，此係據道宣所撰「續僧傳」之六十五歲說。③但以仁壽二年壬戌（西元六〇二年），根據冥詳所撰「行狀」之六十三歲說，最爲正確，詳見日本前嶋信次所著「玄奘三藏」昭和二十八年十月第四版及最近印順導師所撰「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玄奘誕生之地，爲洛陽東方七十華里緱氏縣城東郊（即少林寺西北嶺下）之「陳堡谷」村，亦稱鳳凰谷陳村，即古滑國地。姓陳氏，昆弟四人，仲名素即長捷法師，季名禕即玄奘大師也。——（見行狀續僧傳及玄奘三藏）

玄奘之祖先：在張說西域記序中云：『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此述黃帝虞舜陳國以迄陳平，故諸書均作「漢太丘長仲弓後」，又說「其先潁川人也」。高祖湛，後魏清河太守；曾祖山，後魏征東將軍南陽郡開國公，（上見行狀）上黨太守。（見三藏法師傳）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國子博士，（見三藏法師傳）轉司業，又轉禮部侍郎，（見行狀）食邑周南。因徙河南，故又爲洛州緱氏人焉。（見行狀續僧傳及玄奘三藏）父惠，（一作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郡舉孝廉，拜陳留令，又遷江陵；後隋運將衰，遂息纓冠之心，結薜蘿之志，識者高之。（見行狀及三藏法師傳）母廣平宋氏，隋洛州刺史欽之女。（見行狀）

隋高祖仁壽三年癸亥（西元六〇三年），二歲。

隋高祖仁壽四年甲子（西元六〇四年），三歲。

隋煬帝大業元年乙丑（西元六〇五年），四歲。

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西元六〇六年），五歲。

隋煬帝大業三年丁卯（西元六〇七年），六歲。

隋煬帝大業四年戊辰（西元六〇八年），七歲。

隋煬帝大業五年己巳（西元六〇九年），八歲。

少知色養，溫清淳謹。年八歲，父坐之几側，口授教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今奉慈訓，豈宜安坐。』其早慧如此。——（見三藏法師傳）

時，煬帝西巡，六月丙午至張掖，壬子至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丙辰，煬帝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麴伯雅及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見資治通鑑）

『泰（麴文泰）』與先王（麴伯雅）遊於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見三藏法師傳高昌王見玄奘時自述）

隋煬帝大業六年庚午（西元六一〇年），九歲。

父惠在陳留令任。

隋煬帝大業七年辛未（西元六一一年），十歲。

父惠……（遷）拜江陵令，大業七年（原作業），解纓而返，識者以爲克終。——（見續僧傳）。

十歲時，父卒。——（見玄奘三藏）

隋煬帝大業八年壬申（西元六一二年），十一歲。

父喪之翌年，由仲兄長捷法師迎居洛陽之淨土寺。——（見玄奘三藏）。

兄素……即長捷法師也。……以奘少罹窮酷，携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便預其次。——（見續僧傳）

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玄奘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誦習經業。俄而（行狀作大業之際）有敕於洛陽度二十七僧（據玄奘三藏補「十」字）。時業優者數百，玄奘以幼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爲誰家？答以氏族。又問：求度耶？答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爲？答：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上指出家，爲十一歲時事。）……既得出家，與兄同止，從寺中景法師學涅槃經，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此指研習經論振譽當時之年。玄奘三藏作十三歲時煬帝下敕度僧者誤。行狀及續僧傳作時年十五，當是三五兩字抄寫之誤。）——（見三藏法師傳）

察行狀及續僧傳之時年十五，三藏法師傳之時年十三，非指奘公得度爲僧，乃於淨土寺研學涅槃經攝大乘論·登座覆述而爲寺眾推重之時。……然據文以推論奘公出家之年，自以十一歲爲近之。續僧傳於「年十一·誦維摩法華」下，接謂「東都恒度便預其次」。三藏法師傳於「將詣道場·誦習經業」下，接曰「俄而有敕·於洛陽度二七僧」。曰「俄而」，曰「便」，可想見即十一歲也。……推論爲十一歲出家，應無不合之處。（佛制：出家之稱，通於沙彌，故七歲以上即可出家。）十五與十三歲，爲修學經論振譽之時，不應視爲得度之年。——（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隋煬帝大業九年癸酉（西元六一三年），十二歲。

隋煬帝大業十年甲戌（西元六一四年），十三歲。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乙亥（西元六一五年），十四歲。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西元六一六年），十五歲。

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聞芳聲，從茲發爽，時年十五也。（三藏法傳文字略，已如前述，唯作「時年十三」。）——（見行狀）

時，涅槃攝論，輪馳相係。……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見續僧傳）

十五與十三歲，爲修學經論振譽之時，……行狀與續僧傳之十五，三藏法師

傳作十三，不外傳寫之誤。——（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即恭帝義寧元年丁丑（西元六一七年），十六歲。

以上六年，（壬申至丁丑，西元六一二——六一七年，）與仲兄長捷法師同住洛陽淨土寺。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恭帝義寧二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西元六一八年），十七歲。

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爲桀跖之窠，河洛爲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眾銷亡，……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余聞唐帝驅晉陽之眾，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乃與俱來。時武德元年矣。——（見三藏法師傳）

承沙門道基……法俗欽仰，乃從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見續僧傳）

偕兄長捷，行達長安，從高僧道基於莊嚴寺，時年十七歲。——（見玄奘三藏）

唐高祖武德二年己卯（西元六一九年），十八歲。

以到達長安之翌年，（據玄奘三藏，）景脫基暹，……多遊綿蜀，知法之眾，又盛於彼。……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又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相見悲喜；停月餘，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因住成都空慧寺。——（見三藏法師傳）

經子午入漢川，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從之受學，仍逐進向成都，雖在行旅，恒執經隨問。比至益州，攝論毘曇各得一遍。——（見行狀）

唐高祖武德三年庚辰（西元六二〇年），十九歲。

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更聽寶暹攝論道基毘曇。……四五年間，究通諸部。（三藏法師傳文字略同，唯四五年間作二三年間。）——（見行狀）

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毘曇論。……至於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巖穴條疏本幹。……又僧景攝論，道振遐邇，……皆師承宗據，隅隩明銓。——（見續僧傳）

唐高祖武德四年辛巳（西元六二一年），二十歲。

二三年來，滯布成都。——（見玄奘三藏）

玄奘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愆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具，病者慙愧，乃授般若心經，因常誦習。——（見三藏法師傳）

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西元六二二年），二十一歲。

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亦一遍斯得。——（見行狀）

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註無窮。——（見續僧傳）

法師年滿二十，（滿者指實足言，以干支計則二十一歲矣，）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乃私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荊州天皇寺。——（見三藏法師傳）

滯在成都者首尾四年，達滿二十歲，受具足戒。……（坐夏後，）潛離其兄，賴商舟通三峽而遁下荊州，寄身天皇寺。——（見玄奘三藏）

受此具足戒已，名為比丘。此則佛制以「年滿二十」即二十一歲，乃合法定之受具足戒年齡。故奘公謹遵佛制，武德五年為二十一歲，於成都受具。……律制，比丘受具足戒已，遇安居期，即應坐夏安居。……故依佛制，受具以後，即應坐夏學律。以此，行狀及三藏法師傳所說「年滿二十，即於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深合佛制。……實則武德五年年二十一，為三書所公認。受具坐夏學律，即是受具坐夏學律，不勞別解也。——（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西元六二三年），二十二歲。

寄身天皇寺後之翌年，北向發足，渡黃河，學於相州（河北大名）之慧休法師者八月，便北行至趙州而師事道深法師者十月。（係取先後途次於行狀及三藏法師傳，復取月數於續僧傳。）——（見玄奘三藏）

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逢休法師，質問疑礙；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見行狀）

便北達深所，……始終十月，資承略盡。……沙門慧休，道聲高邈，行解相當，……昌言傳授，又往從焉。……偏為獨講雜心攝論，……相續八月，領酬無厭。——（見續僧傳）

唐高祖武德七年甲申（西元六二四年），二十三歲。

武德七年，二十三歲時，再入長安，滯在大覺寺，學道岳法師之俱舍論。——（見玄奘三藏）

又入長安，就岳法師學俱舍論。……又於京城諸德，尋訪異同。——（見行狀）

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弘有部，……乃又從焉。……沙門法常，一時之最，……奘乃一舉十問，皆陳幽奧。……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沙門玄會，匠剖涅槃，刪補舊疏，……諮質遲疑，渙然祛滯。——（見續僧傳）

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西元六二五年），二十四歲。

僕射宋公蕭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寺。然非本志，情栖物表。——（見續僧傳）

僕射宋公蕭瑀兄弟，又深珍敬，奏住大莊嚴寺。——（見行狀）

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西元六二六年），二十五歲。

八月，高祖李淵退帝位稱太上皇，秦王世民登帝位，以翌年為貞觀元年。

唐太宗貞觀元年丁亥（西元六二七年），二十六歲。

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攷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其惑，並取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以釋眾疑。……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見行狀及三藏法師傳）

貞觀三年，（元年之誤，）將欲首途，又求祥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九（應作六也。）——（見行狀）

貞觀三（應作元）年秋八月，將欲首途，又求祥瑞，……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見三藏法師傳）

乃大惟曰：『余周流吳（應作荆）蜀，爰及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命，雖蘊胸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覲成言用通神通。一覲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年二十九也。（九字傳寫之誤，應作六。）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為通引。頓迹京臯，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便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應作元）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逐豐四出。幸因斯際，徑往姑臧，漸至燉煌。——（見續僧傳）

貞觀元年，玄奘二十六歲。……貞觀元年秋八月，出長安而行。——（見玄奘三藏）

考之唐書：「貞觀元年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郡霜害秋稼」。三年則並無霜儉之事。……然則諸書何以悉云貞觀三年西行？事殊費解。梁任公之歷史研究法，以為諸書為依據同一藍本，藍本誤而悉誤。此為唯一合理的解說。蓋古書多屬抄寫，雜以行草，誤讀元年為三年極為可能。……今知三年乃元年之誤。四月與八月（仲秋）之歧說，應如何決定？今謂應是八月。其理由為：①西域記與三藏法師傳同，仲秋即八月，明文不應有誤；而四月之四，可能乃以八為草四字而致誤。②續僧傳謂「奘公乘霜儉而西行」，唐書固明記霜害穀稼為八月事。③考之奘公西去，通過凌山之時，亦應以八月成行為合。——（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按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諸書多誤。如：行狀及續僧傳中作「貞觀三年」，道宣內典錄中作「貞觀三年出觀釋化」，玄奘歸國途中到于闐上表中作「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玄奘請聖教序表中作「奘以貞觀三年私往天竺」，西域記辯機記贊中作「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道路杖錫遐征」，三藏法師傳中作「貞觀三年秋八月」，三藏法師傳慧立論贊中作「貞觀三年秋八月立誓裝束拂衣而去」，辭源唐僧取經條作「武德初」，（舊唐書作貞觀初，）辭海同條作「貞觀三年冬」。除辯機記贊之「仲秋朔旦」與三藏法師傳及其論贊之秋八月為月份不誤外，其餘年月均誤。唯玄奘三藏書中所記之「貞觀元年秋八月出長安而行」，實為正確。古德時賢，對此點均無異議。前考武德五年壬午時玄奘二十一歲，則至貞觀元年丁亥時正二十六歲也。三藏法師傳所說之「時年二十六也」，獨不誤。

今考定為貞觀元年成行，……依六十三歲說，則為二十六歲。……三藏法師傳究何所根據而定為二十六歲？竊謂：行狀作六十三歲，此年適為二十六歲。殊可注意！前來考證，三書所持之年齡雖不相同，而武德五年二十一歲（二十歲滿）受具說，續僧傳及三藏法師傳，並取行狀之說。而西行之年，續僧傳亦與行狀同。可推見關於西行之年歲，本為二十六歲，三藏法師傳乃舉而書之。唯行狀及續僧傳之六字，以形誤而傳寫為九，致與六十三歲不符耳。——（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釋迦方志云：「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里至瓜州」。以每日行百里計，須時三十餘日，而奘公在涼州停月餘日，至瓜州又月餘日，月餘日，姑以三十五日計，則自長安起行至瓜州動身，道行及停留共約一百零五日。據八月初起行以為推算，瓜州動身時為十一月中旬。次「從此（瓜州），北行五十餘里……上置玉門關」。奘公當夜至關，第二夜過第一烽，第三夜過第四烽。次行百餘里（可二日程），失

水，四夜五日滴水不沾喉。夜半得水，就草池一日停息，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哈密）。此一難苦行程，約十三四日。是樊公抵伊吾時，已十一月底矣。次「在伊吾經十餘日」，經六日至高昌界。——（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唐太宗貞觀二年戊子（西元六二八年），二十七歲。

由伊吾到高昌，僅六日行程。元年八月初出長安，到著高昌國都（今吐魯番西二十華里之所）時爲其翌年（貞觀二年）之初，法師二十七歲之春也。——（見玄奘三藏）

（在高昌王城）住十餘日欲辭行，爲高昌王苦留，乃水漿不涉於口者三日，第四日王意迴，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臨行，奉啓高昌王致謝。自入伊吾，至別離高昌，約經七旬，則是時已貞觀二年二月中旬。——（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高昌王）又修二十四封書，與突厥葉護可汗等諸國，並附綾練（絹）五百餘疋令遞送，云：『法師者，是奴弟。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使達婆羅門也。』於是辭去。——（見行狀）

（玄奘）上啓謝（王）曰：『……玄奘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前證大業八年壬申十一歲出家，計算至此貞觀二年戊子二月，首尾十七年，故曰「年將二紀」。）……』——（見三藏法師傳）

次自高昌西行七百餘里至阿耆尼（焉耆即喀喇沙爾），可八日程（見釋迦方志），未有停留。次西南行三百餘里，又川行七百里，至屈支國（龜茲即庫車。）時爲三月初旬，與三藏法師傳之「時爲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留六十餘日」，情形相合。依西域記，凌山固「山谷積雪春夏含凍」，非盛夏不宜通行者，樊公約於五月中旬離屈支。西行二逢賊，又前行六百里至跋祿迦國（姑墨即拜或稱阿克蘇），再西北行三百里而至凌山。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通過凌山雪道，甚爲適合。——（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天山山脈中之凌山，即今之巴達爾□，葱嶺北隅也。入山西北進，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山之北面有周圍千餘里之熱海，即今之伊次希克湖。循湖之南岸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Tokmak）逢突厥統葉護可汗。既與相見，可汗令且向衙所，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見玄奘。因停留數日。可汗令通漢語及解諸國音者伴送玄奘。

此時之可汗，一般謂係統葉護可汗。——（見玄奘三藏）

自梁任公考出葉護可汗卒於貞觀二年，而後樊公於貞觀元年開始西行乃成不易之定論。今略爲敘述：樊公西去，曾晤見西突厥葉護可汗，並得其助力。然新唐書薛延陀傳謂：『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新唐書突厥傳亦謂：『（葉護死後，）』乙昆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昆可汗分王其國，爭鬪不解，各遣使朝獻。』舊唐書同。此與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冬十一月丙午西突厥高昌遣使朝貢」之說合。如樊公於三年西行，（抵突厥應在四年，）則何能與葉護可汗相見？——（見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

自此西行鈿百餘里至屏聿（千泉即今之塔爾達附近），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咀邏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笈赤建國，又西二百里至赭時國（者舌即石國今之塔什干）。（西臨素葉水即錫爾河，亦稱吹河或藥庫沙爾台斯

河。)又西千餘里至窣堵利瑟(東臨素葉水),又西北入大磧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悉萬斤即康國今之撒馬耳干)。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何國今 kerminch 附近),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浩罕即東安國),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布豁即中安國),又西百餘里至伐地國(和犢即西安國今之 Asterabad),又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彌伽國(今之 Khiva 東臨縛芻河即阿姆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史國古之粟特今之 Kesh),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突厥之關塞),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即古之大夏國,北據鐵門,而縛芻河中境西流,)南下數旦里出縛芻(舊譯博叉)河之岸邊,渡河至活國(今 Kundus 譯作昆杜茲),爲逢其設喪故淹留月餘。西至其屬國縛喝羅(即 Bactria 之 Balkh 北臨縛芻河)。大城西北五十里有提譜城,城北四十里有波利城。(遇佛於鹿野園時之二長者 Trapusha 與 Bhallika 之故鄉。)止於大城西南郊之納縛伽藍(新寺),遂停住月餘,就般若羯羅(慧性)讀毘婆沙論。又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陀國,再西南至胡實健國。旋與慧性法師相隨自大城南行百餘里入揭職國,再東南入大雪山(今興度庫午山脈)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今拔迷耶因)境,(在雪山中,北負絕壁,)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如是漸到梵衍那都城,王迎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如是經十五日。

出梵衍那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遇獫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國(Kapisa 亦譯罽賓)之邊境。

玄奘遂入印度之境,時期可推定爲貞觀二年之冬。——(見玄奘三藏)

唐太宗貞觀三年己丑(西元六二九年),二十八歲。

與慧性法同止沙落迦小乘寺(漢時大月氏迦膩色迦王二世爲疏勒國質子臣盤夏居所建),即於寺夏坐。應國王請於一大乘寺法集,如是五日方散。安居訖,與慧性別,東進行六百餘里黑嶺至濫波(Lamghan)國,(北背雪山,三垂黑嶺,附屬於迦畢試國,自斯以北皆號邊地,西距迦畢試經歷山道八日程,)停三日。從此東南行百餘里下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喝國,(即那伽羅,役屬迦畢試,)巡禮龍王窟中佛影等諸聖迹。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陀羅國,(Gandhara 與 Kapisa 爲鄰國,都城爲富樓沙,即今之 Peshawar 譯作拍紹阿或白沙華,東臨印度河,)巡禮諸聖迹。更東南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茶城(南臨印度河),巡禮娑羅觀邏城之波你尼故里。從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Udyana 在 Gandhara 之東,)巡禮瞿揭釐城(即烏仗那之王城)附近諸聖迹。又從烏鐸迦漢茶城南渡印度河至呾叉始羅國。(Taxila 先役屬迦畢試,後又附庸迦濕彌羅,以 Jhelam 河與鉢露羅國即今 Balti 聯境。)從呾叉始羅北界渡印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經大石門,又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即喀什米爾亦譯罽密),先入其國境之西石門,巡禮諸伽藍,夜宿護瑟迦羅寺,如是滯在數日,進向王城(Srinagar 譯作善見城),離約一由旬到達福舍,王迎進都,止闍耶因陀羅寺,聽大德僧稱講俱舍論順正理論因明聲明及大毘婆沙。如是停留首尾二年。

唐太宗貞觀四年庚寅(西元六三〇年),二十九歲。

與前考玄奘進入印度西北之迦畢試國境時爲貞觀二年之冬,又坐夏於迦畢試之沙落迦寺(當是翌年即貞觀三年之夏),則其離迦畢試時已是貞觀三年之秋。其在迦

濕彌羅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當爲貞觀三年冬以迄四年之春。（玄奘三藏書中作二年未至三年之大部份者，誤。）

西南逾涉山澗行七百里至半笈嗟國（今波那曲）。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闍補羅國。（即邏闍波拉，附庸於迦濕彌羅。）自出遏邏闍補羅國經三日渡□達羅婆伽河（月份河）到闍耶補羅城，宿於西門外外道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從此入那羅僧訶城，通過市街，在其東方之波羅奢大森林中遇賊，投村宿，明日到磔迦國之東境，先至一大城，見其城西道北之長年婆羅門，就停一月學經部百論廣百論。又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脂那僕底國（漢封國），止突舍薩那寺，從毗膩多鉢臘婆（調伏光）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因住十四月。（十字疑衍，依日程計算，以任四月爲可能。）從此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答秣蘇伐那僧伽藍（闍林），妄禮過去四佛遺迹。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止那伽羅馱那寺，從□達羅伐摩（月胄）學眾事分毗婆沙，因就停四月。更向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國（窟露羅），南行七百餘里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西臨大河，）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中印度境），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兔羅國，巡禮聖弟子舍利弗第諸窣堵波。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罕祿勤那國，（北背大山，東臨恒河，閻牟那河中境而流，）遂住一冬半春（翌年之春），就聽闍耶毘多經部毗婆沙。（玄奘三藏書中繫此於貞觀三年之暮以迄四年之春者，誤。）

高昌王麴文泰於貞觀四年親訪長安，太宗優遇之。——（見玄奘三藏）

唐太宗貞觀五年辛卯（西元六三一年），三十歲。

繼續就聽半春訖，渡恒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止德光伽藍，就學德光辯真論於蜜多斯那者又半春一夏。從此東南行經六國，又東南行經於七國，至勢比他國，巡禮城東二十餘里大伽藍之三寶天塔。從此西北行不足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曲女城西臨恒河，占五印度之中央，今之迦那瞿，其舊不城稱花宮，）止跋達邏毗訶羅寺三月，依毗離耶犀那讀佛使日胄兩毗婆沙訖。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恒河南室阿踰陀國，巡禮城內世親論師故伽藍城北郊菴沒（芒果）大林中無著論師故伽藍及附近聖迹。即乘船順恒河東下，河中遇賊擁船向岸，得免後東行三百餘里渡恒河北至阿耶穆法國，巡禮佛使論師故伽藍及諸聖迹。更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恒河至鉢邏那伽國（據恒河與閻牟那河之交），巡禮城西南瞻博迦華林中聖亦及提婆論師故伽藍。從此西南（一作東北）入大林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巡禮聖迹。從此東北行密林中七百里渡恒河北至迦奢布羅城，更東進百七十八里入鞞索迦國。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舍衛），巡禮諸聖迹。從此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此羅代寧堵國（迦毘羅衛今 Oudh 附近）。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國，巡禮聖迹。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巡禮娑羅林佛涅槃處。從此復大林中行經五百餘里至婆羅痾斯國，（一作婆那羅斯，西臨恒河，）渡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鹿野伽藍。從此順恒河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今伽奇波羅），巡禮城東二百餘里之不穿耳伽藍。從此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恒河至摩訶娑羅邑，從此東北渡恒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巡禮城內外諸聖亦。從吠舍釐南境去恒河百里到吠羅補羅城，得菩薩藏經。又

南渡恒河至摩揭陀國，（其舊都 Pataliputra 譯稱華氏城，今 Bihar 省會之 Patna，北瀕恒河，離孟加拉海灣約三百英里，）即在故宮小城停七日，巡禮聖迹。又西南行六七由旬至低羅釋迦寺，從此又南行百餘里禮拜菩提樹金剛座，（時逢眾僧解夏，）停八九日，遍禮其處充滿一由旬之聖迹。第十日有那爛陀寺（施無厭寺）大德來迎，行可七由旬至寺，（寺據摩揭陀國舊都王舍城之北郊，尼連禪河之東岸，佛陀伽東北七由旬處，）既見正法藏，戒賢問「在路幾年」？答「三年」。（按：從貞觀元年八月起算至此時，至少是四，或因高昌以前日數不計在內，故答云三年。）於那爛陀寺安置已，先向王舍城巡聖迹訖，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講瑜伽論。時為貞觀五年三十歲時之秋末或初冬。

唐太宗貞觀六年壬辰（西元六三二年），三十一歲。

玄奘在那爛陀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論二各三遍，並尋決疑俱舍婆娑六足阿毗曇等，兼學婆羅門書。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

唐太宗貞觀七年癸巳（西元六三三年），三十二歲。

唐太宗貞觀八年甲午（西元六三四年），三十三歲。

唐太宗貞觀九年乙未（西元六三五年），三十四歲。

玄奘學於那爛陀寺戒賢者，首尾經五歲。

貞觀四（當是五）年之初秋（當是秋末或初冬），二十九（當是三十）歲時起，迄同九年三十四歲止，就庶賢孜孜續學。——（見玄奘三藏）

貞觀九年，玄奘出那爛陀寺。——（見玄奘三藏）

從此沿恒河東下，先至二百里許之迦布德寺，乃出至三百里許之伊爛拏鉢伐多國（今孟傑爾），滯在一年間，就但他揭多毬多與羸底僧訶二大德讀毗婆沙順正理等，遂迎翌年三十五歲之春——（見玄奘三藏）

唐太宗貞觀十年丙申（西元六三六年），三十五歲。

沿恒河南岸東下三百餘里入瞻波國（今跋伽羅波爾）。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啞祇羅國（今羅伽嗎哈爾）。自此東渡恒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今拍婆那之羅恩婆爾），妄禮聖迹。自此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賴那國（金耳國今馬爾達附近）。從此東南出三摩怛吒國（今伽恩羯斯地帶之弗阿里獨波爾），巡禮聖迹。自此西南下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今之 Tumluk 譯作吐門魯克在印度東海岸），即由西南陸路進向烏荼國（今阿里沙地方），巡禮聖迹。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今羯羅迦湖附近之地），從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伽國（今阿里沙省城），自此西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僑賞羅國（今拏古波爾及白拉爾州），巡禮聖迹，停留月餘日，就其國婆羅門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都城白恩羯羅今愛羅爾附近）。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都城即今阿嗎伐底附近），巡禮城東之東山僧伽藍及城西之西山僧伽藍。（即東山住部及西山住部之地。）因停數月，就蘇部底蘇利耶二僧學大眾部根本部阿毗達摩等論，二僧亦依玄奘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禮聖迹。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今奈羅爾州，其都城即今馬獨拉斯北百九里之奈羅爾市，）巡禮聖迹。從此南經大林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茶國，（都城建志補羅今恭羯拉謨即印度南海之

口，) 遇僧伽羅國(今錫蘭)來之菩提迷祇濕伐羅、阿跋耶鄧瑟□羅·二大德，玄奘引瑜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解。自達羅毘荼西北歸，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國(今枯羅奴爾之白拉利)。從此西北經大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佗國，自此西北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咕婆國(跋祿咕)，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自此西行三日至契吒國(今迦朱)，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毘國，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今跋那斯河南方之域)。又自伐臘毘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刺佗國(今迦佉華爾半島之西南部)。又自伐臘毘國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都城昆拉嗎拉今羅伽坡他那之跋羅美爾)，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今烏伽英)。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今枳陀爾附近)。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今古華利阿爾附)。從此又西還西海岸之蘇刺佗國，再西進至阿點婆翅羅國(今印度河口附近)，從此西行不足二千里至狼揭羅國。(今巴爾基斯坦之北部有狼伽族之遺留。)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耆荼國。從此東北行七十一餘里至信度國，從此東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就其國二三大德學正量部根本阿毘達摩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滯在二年。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丁酉(西元六三七年)，三十六歲。

自貞觀九年出那爛陀寺，至滯留鉢伐多國二年時，推定為貞觀十一年三十六歲。連同翌(十二)年，共足四年之長途旅行告終。——(見玄奘三藏)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戊戌(西元六三七年)，三十七歲。

四年之長途旅行告終而再入摩揭陀國那爛陀寺，戒賢老師健在，喜其歸。——(見玄奘三藏)

從此復東南還摩揭陀施无厭寺參禮正法藏(戒賢)。復至西距三由旬之低羅擇(達)迦寺，就般若跋陀羅諮決所疑，因停兩月。復往舊王舍城附近杖林山居士勝軍所，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並問瑜伽因明等疑首末二年。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己亥(西元六三九年)，三十八歲。

滯在杖林山勝軍居士所。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庚子(西元六四〇年)，三十九歲。

正月十五日(三藏法師傳作正月初時)，佛陀伽耶之菩提寺有出佛舍利任道俗禮拜之例，玄奘即同勝軍出往觀禮，此為貞觀十四年三十九歲時事。——(見玄奘三藏)

復巡禮菩提樹及諸聖迹，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戒賢命玄奘為眾講攝大論唯識決擇論。時，師子光先為界講中百論，玄奘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

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玄奘悉破諸外道義，外道屈為奴。

復著制惡見論一千六百頌，以破小乘所製破大乘論七百頌。

迦摩縷波國鳩摩羅王發使再三來請，玄奘遂那爛陀寺携經像與使俱去，以便事畢後逕行返唐。既見鳩摩羅王，又與王同發溯恒河至羯朱啞祇羅國，而戒日王

相見於行營。戒日王請於曲女城作一論難大會。自冬初共兩王逆河而進，而臘月方到會場。玄奘爲大會論主，宣示制惡見論，立大乘義破諸異見，竟十八日無一人敢發難。罷論竟，至十九日，戒日王決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之大施作七十五日之无遮大施第六會，請玄奘參加隨喜。至二十一日發向大施場。

本年中，（因高昌王之貳於西突厥，）唐與西厥起正衝突，唐將軍侯君集襲高昌，大軍迫其國境，麴文泰憂急而死。（高昌以亡。）——（見玄奘三藏）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辛丑（西元六四一年），四十歲。

大施行事開始日期，據西域記云：『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起）……』初一日安佛像，初二日安日天像，初三日安自在天像，初四日施僧，初五日至二十五日施婆羅門，其次後共十日施外道，其再次後共十日施遠方求者，其最後共三十日施貧窮孤獨，合計共施七十五日。會訖，玄奘辭欲歸唐，復留連十餘日，於是告別，戒日王鳩摩羅王及諸眾相餞數十里，玄奘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之護衛軍鞍乘漸進，戒日王鳩摩羅王跋吒王等於別後三日復將輕騎前來送別，仍遣達官奉王書護送，所經諸國令發乘遞送。

自發鉢羅耶伽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至僑賞彌國，巡禮聖迹訖，復與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國，重禮天堦聖迹。復西北行三由旬至毘羅那拏國都城，停兩月，爲講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闍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城），復停一月。烏地多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壬寅（西元六四二年），四十一歲。

復山澗中行，如是二十餘日，至怛叉尸（始）羅國，停七日。

平安無事到著怛叉尸羅國，當是貞觀十六年初。——（見玄奘三藏）

又西北行三日至印度大河，以風波而失五十夾經本及花果種等，迦畢試王自烏鐸迦漢茶城來迎，遂入城一寺停五十餘日，爲遣人往烏長那國抄寫迦葉辟耶部三藏以補失經。迦濕彌爾王亦遠來躬拜，累日方歸。玄奘遂與迦畢試王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濫）波國境，進至都城，止一大乘寺。自此復正南行十五日至伐刺拏國（今華那北之跋奴地方），巡禮聖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吒國（都城鶴悉那），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儻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爲七日大施，施訖，又東北行一由旬至瞿盧薩謗城，與迦畢試王相別，北行，王遣百人送度雪山，行七日至大山頂，自是策杖而前不得乘馬，復經七日至一高嶺，宿於嶺下村中，夜半發，至明晝方渡陵嶮，翌日到嶺底，復登一嶺，是日將昏方到山頂，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羅縛國，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濶悉多國（Khost）。從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Kundus），停一月，得詳高昌國之運命。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癸卯（西元六四三年），四十二歲。

由活國出發，當在貞觀十七年四十二歲之時。——（見玄奘三藏）

由葉護可汗之孫遣人護衛，東行二日至瞿健國，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怛羅國（今 Himatala, Kokeha 河南方之地），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拔特山城今之巴達克山），爲寒雪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今 Jamgan 之北

方)，又東南履危躡嶮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Kuran），從此又東北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都城塞迦審 Wakhan 之南部，北臨烏澗河即縛芻河。）從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都城昏馱多今瓦千之西部。）又越摩悉鐵帝國至商彌國。（治山中，南臨黑河，今 Mostoij 地方。）

由瓦千（Wakhan）東進，出波謎羅川（帕米爾溪谷），通過葱嶺（帕米爾高原）最高部之八谷，……在最地點有大龍池（天池即阿耨達池今沙利庫爾），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湖水澄清，莫測其深，飲之甘美，……此湖流出之水，一者西流而合於阿姆河（縛芻河亦譯博叉河），一者東流而合於徙多河（即斯徒河下游別稱塔里木河）。……帕米爾溪谷東部無人之山中，蹈冰雪而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國。（其都城在絕壁之上，北背徙多河，今 Sarikol 地方。）——（見玄奘三藏）

玄奘在竭盤陀停二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賊，漸進東下冒寒履嶮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鍛國（莎車今葉爾羌），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疏勒即喀什噶爾），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徙多河踰大嶺至斫句迦，（即沮渠，在沙車之東于闐之西，）從此東行八百里入瞿薩旦那國（于闐）境，先至勃伽夷城，（今 Pialma 附近之地，東距王城三百餘里，）停七日，後日發，行二日，離王城四十里宿，明日延入城，止於薩婆多小乘寺，爲于闐王留連，未能即還。

修表使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中有「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實爲「貞觀元年八月」抄寫之誤，）冒越憲章，私往天竺，……歷覽周遊，一十七載，」（自貞觀二年至此貞觀十七年，）等語。經七八月，使還。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甲辰（西元六四四年），四十三歲。

奉敕降使迎勞；並敕于闐等道使諸國給人力鞍乘送燉煌，令燉煌官司迎於流沙，善鄯迎於沮沫。

即進發東行三百餘里至媿摩城（Peim 今 Uzum-tali），從此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從此大流沙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達自境。既至沙洲，又附表陳。

玄奘之再入沙州，推定爲貞觀十八年之十一月。二十六歲時去，四十三歲時歸。——（見玄奘三藏）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乙巳（西元六四五年），四十四歲。

貞觀十九年正月初六日，（一說爲二十六日，二十兩字疑衍，）進至長安之漕渠，宿於漕上。初七日，官司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翌（八）日，迎新來經像至弘福寺。（按：三藏法師傳，有「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明二十八日旦」等語，景子即丙子，爲正月初七日，明且即翌日當是初八日。）

壬辰（正月二十三日），赴洛陽，己亥（二月初一日），謁天子於儀鸞殿。二月六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三月初（己巳）玄奘自洛陽歸至長安，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夏六月戊戌，證義綴文筆受諸大德（靈潤道因栖玄道深道宣辯機慧立玄塵玄謨等）至，丁卯日開始翻譯。六門陀羅尼經一卷當日了，佛地經一卷至辛巳了，菩薩藏經二十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及頌一卷歲暮方訖。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丙午（西元六四六年），四十五歲。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摩雜集論，至二訖。五月十五日，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完成；又開始譯瑜伽師地論（滿二年後始譯竟）。

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三日（辛卯），上表進己譯經論，乙未（十七日）又上表進西域記。丙申（十八日）太宗自答墨敕。丁酉（十九日）上表謝並請新譯經御序。——（見沙門玄奘上表記）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丁未（西元六四七年），四十六歲。

本年，埋首譯經。於正譯之餘，又譯因明論一卷。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戊申（西元六四八年），四十七歲。

夏五月甲午，翻瑜伽師地論一百卷訖。六月庚辰敕追玄奘赴玉華宮（長安北六百餘里玉華山麓之離宮），既至，見於玉華殿。帝遣使向京取瑜伽論，論至，帝自詳覽，因敕所司簡秘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爲九本以頒九州，並御撰大唐聖教序，敕貫眾經之首。玄奘上表謝。皇太子撰述聖記，玄奘上啓謝。

皇太子治時年二十一歲，追慕已故生母文德皇后長孫氏，此年於長安城內晉昌里之淨覺寺舊址新建慈恩寺，以祈冥福。

皇太子奉敕撰菩薩藏經後序。

秋七月景（丙）申敕施衲袈裟一領，並賜剃刀一口，玄奘上表謝。

秋九月己卯詔：諸州寺各度五僧，弘福寺度五十僧。

玄奘在玉華宮著手翻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至十月初一日完了。

冬十月之中，帝還京，玄奘亦從還，住於紫微殿西新築之弘法院。晝則帝留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无釋攝大乘論十卷世親證十卷緣起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

十二月戊辰（二十一日），因皇太子之切望，以玄奘爲大慈恩寺上座，移就翻譯。己巳（二十二日）旦，集安福門街迎佛像送玄奘暨五十高僧入大慈恩寺。壬申（二十五日）將欲度僧，皇太子先於辛未（二十四日）出宿故宅，後日（癸酉二十六日）旦蒞寺，然後度僧剃髮觀齋。其日，敕追玄奘還北闕。

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己酉（西元六四九年），四十八歲。

二十三年夏四月，帝駕幸長安南五十里終南山上之翠微宮，皇太子與玄奘並陪從。帝感身體違和。五月己巳（二十六日）加訴頭痛，留玄奘宿值宮中。翌日庚午（時帝五十二歲）帝崩於含風殿，還京始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梓宮之側，以明年爲永徽元年。

玄奘出弘法院，還慈恩寺。

唐高宗永徽元年庚戌（西元六五〇年），四十九歲。

自歸大慈恩寺後，專務譯經。

唐高宗永徽二年辛亥（西元六五一年），五十歲。

二年春正月壬寅，爲賈敦頤等四刺史授菩薩戒並廣說菩薩行法。翌日（癸卯）頤等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參謝。——（見三藏法師傳）

其年八月，阿拉伯之迦利弗使者到長安，此爲唱聖人穆哈默突之什斯蘭教國

家之最初使節。——（見玄奘三藏）

九月，廢玉華宮，改爲玉華寺。

唐高宗永徽三年壬子（西元六五二年），五十一歲。

三年春三月，於慈恩寺西院附近建築高達百八十尺之□塔（今天雁塔），式樣及名稱均有西域風，以安置自印度持歸之經像，而防常散失或火災之難，前後四個月竣工。

夏五月乙卯，中印度摩訶菩提寺苾芻法長來訪慈因寺，帶來智光（時爲摩訶菩提寺之上座）慧天兩大德手書及贈物。

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西元六五三年），五十二歲。

日本大和元興寺之道昭入唐，爲玄奘門下生。——（見玄奘三藏）

唐高宗永徽五年甲寅（西元六五四年），五十三歲。

五年春二月，摩訶菩提寺之法長比丘辭還，索報書，玄奘分別答智光慧天以手書及贈物。

唐高宗永徽六年乙卯（西元六五五年），五十四歲。

六年夏五年庚午，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一卷。此論與因明論同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

唐高宗顯慶元年丙辰（西元六五六年），五十五歲。

春正月景（丙）寅，以武后故易儲，十三歲之皇太子忠出爲梁王，即以其月冊立三歲之代王弘爲皇太子，代子就大慈恩寺設五千僧齋，人施帛三段，敕朝臣行香。

二月十日，迎玄奘赴禁中鶴林寺（後改稱隆國寺）爲河東群夫人（寶乘尼）授戒，三日方了。又赴鶴林寺側之德業寺爲尼眾數百人授菩薩戒，事訖辭還。

三月癸亥，御撰大慈恩寺碑文訖，禮部送碑文至，鴻臚寺亦有符下寺，甲子，玄奘率寺眾詣闕上表謝。大帝御筆書碑並匠鑄訖，夏四月八日將欲送寺，以初七日夜雨路不堪行，初十日始晴，至十四日旦始迎碑至寺，。十五日度僧七人，設二千僧齋。十六日，玄奘又與徒眾詣朝堂上表謝。

夏五月，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尙藥奉御蔣孝璋等奉敕給侍醫藥，晝夜不離，經五日方減，內外情安。翌日，上表陳謝，並附陳佛老名位先後及僧道同俗推勘二事於國非便狀。二十三日，降敕：僧尼有過，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玄奘遣弟子大乘光奉表詣闕謝。玄奘病癒後又重進表謝，帝覽表知已病癒，遣使迎入宮，安置於凝陰殿院之西閣，仍彼翻譯，經二三旬方得一出。

秋八月戊子（十九日），以延康坊濮王泰故宅，建築西明寺。

冬十月，武后在難（產前），依賴玄奘爲安產之祈禱。十一月五日，后施衲袈裟一領及雜物等數十件。是日申後酉前，忽有赤雀飛來止於御帳，頃間，后已安產，高宗之第七子顯誕生，命名佛光王。（其兄弘天折後立爲皇太子，即唐朝第四代之中宗。）十二月五日滿月，敕爲佛光王度僧七人，仍請玄奘爲王剃髮。

唐高宗顯慶二年丁巳（西元六五七年），五十六歲。

二年春二月，帝幸洛陽宮，玄奘陪從，並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既到，

安置積翠宮。夏四月，帝避暑於明德宮（即隨之顯仁宮），玄奘亦陪從，安置飛花殿。五月，敕玄奘還於積翠宮翻譯。

洛陽東七十里之陳堡谷，爲玄奘誕生地。因茲扈從，暫得還鄉遊覽舊□，訪問親故淪喪將盡，唯有一姊適瀛州（河間）張氏，遣使仰來，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壠所在，乃進表請更詳勝地而改葬。表中有「時逢隋亂·殯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壠頽毀·殆將滅夷」等語。自隋大業七年算至顯慶二年正是四十七年也。既蒙敕許，遂改葬西原。

秋九月二十日，玄奘上表請入少林寺翻譯，表中有「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颯焉已至」等語。近印順導師解脫爲：『已與以，古多通用；以，古每作□。故可解說爲「已至乃且至之訛奪」。如六十之年颯然且至，則行狀之年六十有三說無有不合者也矣。』其月二十一日，帝手詔不許。

冬十一月，時在積翠宮翻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帝聞之，即供奉內醫呂弘哲宣敕慰問，並許外出將息。經三日後，遣使迎入供養，留連累日，敕還積翠宮仍舊翻譯。

唐高宗顯慶三年戊午（西元六五八年），五十七歲。

三年春正月（玄奘三藏書中作二月四日），帝還西京長安，（時以洛陽爲東京，）玄奘亦隨還。

六月，於長安西部建築西明寺工竣。秋七月，敕玄奘徙居西明寺。其月十三日，於西明寺建齋度僧。十四日，舉行盛大入寺儀式迎玄奘及大德五十人入寺。唐高宗顯慶四年己未（西元六五九年），五十八歲。

四年冬十月，玄奘爲欲作二十萬頌大般若之全譯，率譯經諸大德暨弟子等，離長安而移住玉華寺（即舊離宮），居寺內之肅誠院。

唐高宗顯慶五年庚申（西元六六〇年），五十九歲。

五年春正月一日起始翻大般若經。還依廣翻，不敢更刪，一如梵本。

中間又翻成唯識論辨中邊唯識二十論品類足論等。

唐高宗龍朔元年辛酉（西元六六一年），六十歲。

唐高宗龍朔二年壬戌（西元六六二年），六十一歲。

以上兩年及翌年，專意翻譯大般若經。

唐高宗龍朔三年癸亥（西元六六三年），六十二歲。

大般若經之譯業，滿三年十一個月，足掛四年，至龍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譯終最後之頌，合成六百卷。至十一月二十三日，令弟子窺基奉表進經。

唐高宗麟德元年甲子（西元六六四年），六十三歲。

麟德元年正月一日，……謂弟子及翻經僧等：『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之質，何得久停。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於玉華。……』——（見行狀）

麟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於玉華。』（五當是三抄寫之誤。）——（見續僧傳）

汲汲然恒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五當是三之誤），必當卒命

於此伽藍。」(傳中誤繫此語於初翻大般若經時。)——(見三藏法師傳)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告眾曰：『……死期已至，勢非賒遠。……』——
(見三藏法師傳)

春正月九日暮間於房後度渠失脚跌倒，脛板傷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六日，如從夢覺。二月四日之夜半，玄奘合掌良久，遂以右手支頭，左手伸左□上，舒足重疊，右脇而臥，迄至命終，竟不廻轉，不食不飲。至五日夜半，弟子普光等問：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院不？玄奘報云：得生。言訖，喘息漸微，少間神逝。

二月九日旦，玄奘訃報達於長安，帝爲之罷朝。其月二十六日下敕：「葬事所須並令官給」。三月六日又敕：「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爲抄寫，自餘未翻者總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僧眾各放還其本寺。」三月十五日，又敕：「許京城僧尼於葬日以幢蓋送至墓所。」四月十四日，葬於長安東郊滻水東方之白鹿原，十五日旦掩坎訖，即於墓所設齋而散。至總章二年己巳(西元六六九年)四月八日，有敕徙葬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佛光王登帝位後(即中宗西元七〇五年後)，始謚大遍覺。

三、後記

爲玄奘代代考證者，梁任公先生以後，有劉汝霖氏(見北平女師大學術季刊)及日本之前嶋信次氏。近又有羅香林先生(見香港佛教一一三期)及印順導師(見海潮音四十二卷四月號)。今以印順導師所論者，與前嶋信次所推定者，兩相對照，無有不合。唯前嶋信次氏所著之書較詳，間有一二處與慧立本三藏法師傳顯見不合者，今已於此譜中指出之。

羅香林先生所以堅主玄奘享年六十九歲之說，係根據最後出之①唐文宗開成二年丁巳(西元八三七年)劉軻所撰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並序，及②後晉時(西元九三七年後)修成之舊唐書一百九十一卷僧玄奘傳(本傳)。以此反證最早出之行狀及續僧傳爲誤，於考證應重視同時人資料之例不合。其以年五十六作僧臘解，如說當時撰者真是連年臘之分亦所不知，未免小看通人！無疑其必爲傳寫致誤或記載失實，不必代爲別解也。若謂舊唐書以唐臣所修國史爲本，但唐自安史之亂以迄後晉，其間兩京迭失，兵禍連年，而謂史文能一無散失並無後人補綴之處，其誰信之！至於將「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一事，硬生生分隔六年之久，想像唐書本傳之「大業未出家」爲大業十二年受具，(其實大業未即是大業之際，玄奘十一歲出家爲大業八年，已是衰亂末世，故曰大業未，)謂爲玄奘二十一歲時；想像武德五年坐夏學律，謂爲玄奘二十七歲時。此二想像的假定一立，遂置佛門受具坐夏之慣制於不顧。祇有大膽假定而求證未有抉擇，一小不心而結論左矣。

雖然，考證是一種科學方法，所證之結果縱或左誤，而方法之本身，爲研究學問之秘鑰，則決無可議。其所以左誤之故，則古書之魯魚亥豕元三三五傳寫互誤誤之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哉斯言！今筆者另寫此一年譜，雖有

諸家之說可依，仍舊難免錯誤，深願博碩君子有以正之。

日本佛史料襍記自序

古者，尚書記言而春秋記事。記事之史，又有編年傳紀本末三體，近代且有通史專史之分。佛教史屬學術史或宗教史，為專史之一。今記日本佛教事而別稱襍記，以異乎編年傳紀本末三體，其亦有說乎？

私以為：似乎編年而事從緯聚，似乎本末而不立標題，並非傳紀而多插小傳，此其所以為襍，蓋不入體例而襍以記者也。

篇中資料甚襍，且不色闕漏，僅任其筆之所至而襍記之，聊為史料整理之別格，不足稱為日本佛教專史，故曰「史料襍記」云爾。

本篇脫稿後，曾於己亥年春分期登載「今佛」刊。今略為整理，另刊單行小冊，爰述其所以名為「襍記」之故如此。

歲次乙巳，新秋，一玄唐曜自序。

日本佛教史料襍記

日本，可說是「以神開國·以佛立國」的國，他們紀元的推定方法是很奇特的。因為日本的「太古曆」是史無可考。百濟國曆博士王保孫傳到日本的曆本（欽明十五年即梁武帝中大同元年丙寅西元五四六年）並未採用，直到百濟僧觀傳授中國宋元嘉曆暨天文推步遁甲算法地理方術等書於日本，（推古十二年隋高祖仁壽四年甲子西元六〇四年，）攝政聖德太子始仿照中國頒定曆本，（以干支計年·六十年為一元·二十一元為一部，）並以辛酉歲為神武紀元之始及國家重大有事之年。（推古九年辛酉即隋高祖仁壽元年西元六〇一年，推前一年部的辛酉歲即周惠王十七年西元前六六〇年，為日本推定神武紀元的開始，實際上恐不及一部而要晚去約四二〇年，當是秦始皇七年之辛酉歲即西元前二四〇年為神武元年。）或謂神武是否實有其人，尚屬疑問；或神武（狹野尊）即是秦始皇所遣以五百對童男女暨五穀農工巧匠以及善射連弩等入海之徐市，（市福通，音亦同，）先居於熊野浦，即日本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地，今和歌山縣熊野郡之新宮町，猶有徐市碑墓；此一問題，不是本文範圍，可以姑置不論。但要注意：日本神話傳說時代的歷史不詳，（在中國史書中，對女王卑彌呼（西元二三九——二四八年）女王臺與，以及贊（西元四〇四——四二五年）、贊弟珍、珍子濟（西元四四三——四五一年）濟子興（西元四六二年）興子武（西元四七八——五一〇年）

等却有著很多的片段記載，)推古以後纔有正確的曆法與史料，而遠涉傳授天文曆法的却是佛教百濟僧觀勒，接受而頒定曆法的却是通曉佛法的攝政聖德太子，從而奠定了日本以佛立國的始基，此實值得在本文上先談一下的。

日本古時，信仰天神地祇，原不知佛教是怎樣一回事。究竟僧觀勒以前何時最初傳入佛教到日本？何時為日本人信佛供佛之始？何為日本出家之始？中間經過些甚麼大挫折？現在把幾個較有根據傳摘記五點於下，以示佛教在日本由不信仰而終成為全國信仰的國教，真是一件難能而可貴的大事。

1 梁武帝普通三年壬寅(西元五二二年)約當於繼體天皇時期，梁人司馬達等到日本，建堂於□田原，供佛禮拜甚恭。當時日本人尙目之為蕃教而無人信仰。**此為佛教初從中國大陸傳入日本之始。**(見扶桑略記及元亨釋書。)隋書倭國傳云：『倭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此「始有文字」期尙未確實推定。宋史日本國傳云：『晉安帝時(東晉元興三年日本應神(贊)甲辰歲西元四〇四年)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此文當是事實。因為在應神天皇十五年八月百濟王遣阿直岐(即知吉師·能通中國經典·其子賀都使主·子孫世為日官·居太和·稱東文氏)到日本，十六年二月又自百濟國徵到博士王仁，(即和邇吉師·傳授論語及鍾繇千字文·子世為文學侍之官·居河內·稱西文氏，)兩人均為皇子菟道稚郎之師；可見東晉安帝時已有中國文字，不過自佛經流入日本以，中國文字更普及於全國了。

2 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西元五三八年)即欽明七年十月，(三國佛教史略作欽明十三年者誤，)百濟聖明王遣使載金銅釋迦佛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別表讚流通禮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果報，乃至成辦無上菩提。……』欽明謂使者曰：『我未曾如是微妙之法。』乃下羣臣議。司外交的大臣蘇我稻目謂：『西蕃諸國皆禮拜之，我邦何獨不然。』司內政的大連物部尾輿與司祭祀的中臣鎌子二人謂：『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欽明曰：『宜付情願人稻目試令禮拜。』稻目欣然跪受，安置於小墾田之家，又捨向原之宅為向原寺以奉佛像。**此為日本人接受佛教設立佛寺之始。**(見日本書記。)但此不過是私人信仰，並非日本皇朝之崇奉。

3 陳宣帝太九年丁酉(西元五七七)即敏達六年冬，百濟王再獻經論若卷暨律師、禪師、比丘尼、咒禁師、造佛工、造寺工。等六人到日本，敏達命安置於難波之大別王寺等處。陳宣帝太建十一年己亥(西元五七九年)即敏達八年，新羅亦獻佛像到日本。陳後主至德二年申辰(西元五八四年)即敏達十三年，鹿深臣、佐伯連·自百濟歸日本，亦得彌勒石像及佛像各一軀，大臣蘇我馬子(稻目之子)求得之。又使人求修行者於西方，得高麗國還俗僧惠使於播磨，馬子以為師，度司馬達之女名曰善信尼，又度其他二女為尼，**此為日本人在佛教出家之始。**馬子在其家宅之東建佛堂，奉置佛像，供養三尼。時司馬達等得佛舍利，獻於馬子，於是馬子信佛益堅，並於疾病中奏請天皇祀佛。敏達諮詢馬子所請於厩戶皇子，(即後之聖德太子，)厩戶曰：『佛法與神道無所異，馬子之請崇信佛法，乃國家之福。』於是敕從其請。**此為日本皇朝祀佛之始。**

4 佛教的挫折，在上述前後，曾有兩度：一度在稻目崇信佛教之後，適值疫

流行，物部氏與中臣氏以爲祀佛之崇，奏請早棄佛像。於是敕投佛像於難波堀江，並焚佛寺。一度在敕從馬子之請國定祀佛之後，以疫病又起，民多死亡，大連物部守屋（尾輿之子）中臣勝海（鎌子之子）奏謂蘇我氏崇信佛法之崇。於是又敕禁佛法。守屋親赴佛寺焚燬殿塔佛像，投佛像之灰燼於難波之堀江，訶責馬子與僧侶，且捕馬子所供養之三尼於海石榴寺，鞭打遊行而後加以禁錮。以上共經兩度，均因迷信神教而不了解佛教，逞其意氣之爭，借題於疫病流行而牽涉到佛教，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事情。

5 陳後主至德三年乙巳（西元五八五年）即敏達十四年，日本國內瘡患流行，死者甚眾，天皇與大連亦患之，民間流言是由於燒燬佛像所致，馬子又奏請祀佛，敏達詔許其獨信佛法，但不勸說他人信佛，並釋還三尼於馬子，馬子乃新營三精舍禮奉三尼。是年八月敏達天皇卒，中經守屋與馬子的構怨爭權者七年，迨炊屋姬皇后（即推古天皇）即位，（隋高祖開皇十三年癸丑西元五九三年，）立廄戶皇子爲太子（即聖德太子），**於是崇信佛法，確定日本皇朝祀佛**。馬子仍爲大臣，恃寵專橫，至推古三十四年戊子（唐太宗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年）馬子死。推古天皇亦於是歲卒。

上述五點，爲日本由不信佛教而終於確立佛教爲國教之經過事實，其關鍵則繫乎聖德太子之深通佛法。

茲略述聖德太子的史蹟如下：

聖德太子爲用明天皇的第二子，皇后穴穗部間人皇女所生，即是隋書倭國傳中所稱之利歌彌多弗利太子。據傳說，臨產之日，皇后尙在宮中行走，忽忙間分娩於廄戶之傍，故稱廄戶皇子。自幼聰明，及壯，同時能聽十人之訟，故又稱豐聰耳皇子。學佛法於高麗僧惠聰、惠慈，學儒學於博士覺笮，均能精通。用明深愛之，使居宮南之上殿，故後稱上宮廄戶豐聰耳皇太子。推古八年庚申（隋開皇二十年西元六〇〇年）**皇太子攝政後，下詔隆佛法**，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見宋史日本傳。隋書倭國傳則作「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詢闕。」）法隆寺（即斑鳩寺）元興寺廣隆寺等大寺均於此時完成，佛教藝術（繪畫雕刻建築等）極爲發達。**又置僧正僧都法頭等以檢校僧尼**。百濟僧觀勒曾任日本僧正，執行綱紀，教育子弟。在中國學習三論宗之高麗僧慧灌又轉至日本講學，**開日本佛學三論宗之始**。推古十四年丙寅（隋煬帝大業二年西元六〇六年）秋七月，天皇使皇太子講勝鬘經，經三日講說竟。是歲，皇太子亦講法華經於岡本宮。天皇大喜，施播磨國之水田百町皇太子，因納施於斑鳩寺。（見日本書紀。）**太子又作勝鬘經維摩經法華經三經義疏，日本尊稱爲「上宮義疏」**。其在法華義疏中，確立了真俗一貫與萬善同歸的宗旨，以使超然物外的佛教，活動於人生生活之中；勉國民廣行萬善，以達同登大果的至善之境。其在勝鬘經義疏中，認定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在一切道俗間，不分男女，原本存在；人人應有同等權能與同等價值的自覺，勉勵女性於自覺自利之下同樣地覺他利他。其在維摩經義疏中，擷取以大乘精神掃小乘偏執的觀點，勉世人正己正人，進而實現利他救濟的社會生活。總之，聖德太子吸收了大乘佛教的精髓，加以躬行實踐；其一貫的精神與其目的，在藉以確立國政的大本，導致國民去惡行善以達於人間佛土的至善境界，使佛教的理想世界化爲現時的人間生

活。故「上宮義疏」亦確有獨到之見解，今均收入大藏經之續藏中。

聖德太子的德政，除上述外，一為採用以干支計年的中國曆法而編修日本國史，一為**十七條憲法**的制定。（推古天皇十二年甲子四月隋高祖仁壽四年西元六〇四年。）此處所謂憲法，與今世所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不同，實為聖德太子的施政方針，揭示道德政治的標準以及臣民奉仕國家的要道，以儒佛兩家混合的思想為基礎而旁採法家之言，皆是針對著當時社會之氏族爭奪、朋黨傾軋、豪族上凌皇室、等積弊而慎重提出的改革方案。此憲法中第二條：『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是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也，何世何人不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其提倡佛教的普及，可說已溢於言表。當時氏族，各祀其氏神，有階級尊卑的不良觀念，且因信仰不統一而全國精神陷於渙散。太子欲使全國崇奉佛教而無優越感或自卑感的階級之分，信仰統一則全國上下的意旨自可集中，且儒教的仁道與佛教的慈悲均可導致人心和平，民德歸厚的至善之果。郎福特氏（J.H. Longford）在其所著日本古代史中稱：『聖德太子，使荒原不堪的時代中，得到了藝術與科學的知識與實用，而更給與涵養國民人格至一千年以上之宗教的莊嚴。』誠非虛語也。

推古十五年丁卯（隋煬帝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七年）太子又遣小野妹子（即大禮蘇因高）使於隋。使者曰：聞西海菩薩天子重興佛教，故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見隋書。）此次入隋的人，除留學生醫惠日、（即藥師惠日、）福因、惠明、高向玄理、南淵清安、大國靈雲、惠光、惠雲、勝島養等人外，並有學問僧僧旻、廣齊、（即惠齊）惠隱等八人，**此為日本派遣留學生及學問僧到中國之始**。（僧旻留唐二十五年，高向玄理與南淵清安留唐三十二年。）推古十六年戊辰（隋煬帝大業四年西元六〇八年）隋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隨小野妹子（即蘇因高）赴日本；同年，小野妹子再奉命送隋使歸。推古二十二甲戌（隋煬帝大業十年西元六一四年）六月又遣犬上御田歙、矢田部造入隋，翌年七月歸日本。前後共往返三次，皆聖德太子所主持。隋朝在推古二十五年戊寅（西元六一八年）即亡，故日本於隋時派至中國的留學生暨學問僧，均於唐代始先後還日本，聖德太子則卒於推古二十九年辛巳，（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年，）年四十六歲，聖德，其法諡也。日本佛教，以聖德太子為中心，一氣呵成了約有三十年的隆盛；孝德天皇繼承遺志，崇佛弗衰；故大化革新時代佛法得大宏揚，而民到於今稱之。

推古三十一年癸未（唐高祖武德六年西元六二三年）僧惠齊、（即廣齊、）醫惠日、（即藥師惠日、）惠光、福因等歸日本，共奏曰：『留於唐國學者，皆已成業，應喚。且其大唐國者，法式備完珍國也，當須達。』（見日本書紀。）此是惠日惠齊等建議，當喚回學業已成的學者，並當繼續派遣學生留學。

日本的遣唐使亦稱入唐使，表面上說是修好，其實為的是學習儒學佛學以及禮樂政刑詩史文辭，為吸收中國文化政策所決定。此後遣唐使，自舒明二年庚寅（唐太宗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年）起，至宇多寬平六年甲寅（唐昭宗乾寧元年西元八九四年）止，其間歷天皇二十六代，只二百六十四年，計遣使二十次；就中，與佛教有關係者亦不少。

茲為寫述的方便，不分別遣入中國或在其本土，一併依事依年略為編次其本末：

前於推古十五年丁卯派遣入隋的學問僧僧旻暨留學生靈雲、勝島養、於舒明四年壬辰（唐太宗貞觀六年西元六三二年）八月，隨遣唐使太上御田歙、藥師惠日之歸舶，還到日本。犬上御田歙與惠日二人原為隋代時之留學生，深通中國情形，先於舒明二年庚寅（唐太宗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年）八月由日本出發，於唐貞觀五年辛卯到達入朝，頗受唐室的歡迎。唐書云：『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至是歸時，太宗並派新州刺史高表仁附舶送之並報聘，**是為第一次唐使到達日本**。（隋朝曾使裴世清赴日本在先，但在唐朝則以高表仁之出使為第一次。）表仁（新唐書入仁表者誤）等浮海數月方到達難波津，日皇遣大伴連養馬迎於江口，使告高表仁曰：『聞天子所命之使到於天皇朝，迎之。』表仁對曰：『風寒之日，飭整船艘，以賜迎之，歡愧也。』及導引入客館，即日賜神酒。（見日本書紀。）高表仁以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之命而歸唐，日皇遣使送至對馬而還。觀此可知，高表仁之使聘與僧旻等之歸日，是同時的事情。僧旻僧日本後，為國博士，於孝德天皇時充顧問，為大化革新重要人物。後此約七年歸日本之高向玄理與南淵清安，前者亦為國博士，充顧問，佐成大化革新的偉業；後者被延聘為中大兄皇子中臣鎌足之師，遂為大化革新功臣。日本典章制度之悉法唐制，以此三人之力為多。

留唐沙門惠隱，於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己亥（舒明天皇十一年西元六三九年）歸日本。翌年五月，設齋會於宮中，奉敕講無量壽經。**是為日僧講淨土教之初見**。（但無量壽經之顯於日本文獻者，則已早見於聖德太子之維摩經義疏。）

道昭，於唐高宗龍朔三年癸亥（天智天皇二年西元六六三年）入唐，親見玄奘三藏法師。玄奘加意教誨，告道昭曰：『經論文博，勞多功少。我有禪宗，汝可承此法傳於東土。』昭喜，修習，早得悟解。玄又指令見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慧滿委曲開示，且付以楞伽經。業成，辭行於玄奘，玄奘以佛舍利及法相唯識的經註疏付之。道昭歸日本，除於元興寺東南隅別開禪院外，兼弘法相宗，**日本聞唯識之旨自此始，行人之習亦自此始**。壽七十二歲圓寂，遺命荼毘，**日本之通行火葬亦自此始**。

文武大寶二年壬寅（唐武后長安二年西元七〇二年）六月，僧道慈隨執節使粟田真人入唐。粟田真人能文知禮，於文武慶雲元年甲辰（唐武長安四年西元七〇四年）七月歸日本。**道慈為三論宗名僧**，留唐時得西明寺之結構圖而歸，聖武天皇改造大安寺時，道慈授其圖於工匠使模仿之，遂為**天平時代建築工藝的特色**。

元明和銅四辛亥（唐中宗景二年西元七一一一年）十月丁卯，日本遣使朝於唐。戊辰敕曰：『日本國遠在海外，遣使來朝，既涉滄波，兼獻邦物，其使入真人莫問等宜以今月十六日於中書宴集。』乙酉，鴻臚寺奏「日本國使請謁孔子廟堂·禮拜寺觀」，從之。（見刪府元龜。）可見佛寺的巡禮，在日本遣唐使的心目中亦是一件好事。

法相宗僧行基，兼修淨土教，為藥師寺僧，相傳為百濟王的後裔。周遊各地，努力教化，大都市以至鄙遠區無不仰慕其風，從之學法者數千人。因此，日本政

府頗注意行基的行動，元大天皇養老年間。（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以「惑百始構朋黨」之嫌獲罪。行基所過地方，遇有險阻，即率其弟子架橋拓路，開鑿溝池，以便民眾。又雕刻佛像，建立寺院，畿內五國即有所建寺院四十九所。聖武天皇神龜年間，（唐玄宗開元年間，）欲造大曰如來佛像，恐與祀神相矛而躊躇。行基首創「神佛同體說」，謂大曰如來乃光明遍照義，與天照大神實為同體。此說實為調和國內祀神信佛間的矛盾與不安，影響於日本當時與後世的思想者甚大。天皇因此無所顧慮，而造像之議遂決。行基遂受天皇尊信，又因參國分寺的建立及東大寺的大曰如來佛像有功，聖武天平十七年乙酉（唐玄宗天寶四年西元七四五年）一躍而為大僧正，**為日本僧官設大僧正之始**。聖武天平感寶元年己丑（唐玄宗天寶八年西元七四九年）正月，天皇暨光明皇后同就行基受菩薩戒，此**為日本天皇受戒之始**。同年二月，行基圓寂，壽八十歲，世稱行基菩薩。聖武天皇時代，**國分寺的建立**，（建立於諸國國府附近，）**為日本佛教興隆的高潮**。初，天武朝命諸國讀金光明經，每家供佛像禮拜，持統朝須發仁王般若經金光明經於諸國使講讀，文武朝每國置國師，聖武天平九年丁丑（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西元七三七年）命每國造丈六金銅佛像，天平十二年庚辰又命每國建七重之塔，佛教已遍於日本全國。至天平十二年辛巳（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年）三月，始仿唐制頒建立國分寺之詔，命每國建立國分僧寺及國分尼寺。僧寺稱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備金光明經十部，（為修護國息災法會，）食封五十戶，施水田十町，置僧二十人。尼寺稱法華滅罪寺，備法華經十部，（為有龍女得道故事，）施水田十町，置尼十人。天平十六年甲申（唐玄宗天寶三年西元七四四年）詔諸國每國撥正稅四萬束，平均分施於僧尼兩寺，准其年年各以其所得的二萬束貸與他人，取其利息建造費用，以期諸國的國分寺早日完成。天平十九年丁亥（唐玄宗天寶六年西元七四七年）又派遣監察使視察建造工程情況，以郡司中有材幹者專司其事，許其於三年內竣工者子孫得世襲郡司。光明皇后崩御時，諸國國分尼寺作彌陀淨土之畫像，書寫「稱讚淨土經」，更定彌陀三尊（俗稱西方三聖）為國分尼寺之本尊；其由中將姬之發願而成藕系曼荼羅的觀無量壽經九品淨土之描出，天平藝術之逸品，最著名聞。孝謙朝，為足諸國國分寺建造之早於觀成，亦定有種種獎勵辦法。大約在光仁天皇寶龜年間，全部工程始告完成。國分寺仍各設國師，使掌教化。

元正養老元年丁巳（唐玄宗開元五年西元七一七年）三月，學問僧**玄昉**暨留學生吉備真備等隨遣唐使阿部仲麻呂入唐。阿部仲麻呂仕於唐，易姓名曰朝衡，朝一作鼂或晁，曾一度思歸日本，漂流遇險失蹤，傳聞其死，李白乃作哭晁卿行，晁卿遇救返唐，遂終身仕唐不歸，唐代宗大曆五年庚戌（西元七七〇年）客死於唐。僧玄昉與吉備真備留唐之長安十餘年，研讀經史，玄昉且受有紫衣殊榮，於聖武天平六年甲戌（唐玄宗開元二十年西元七三四年）偕歸日本，携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大衍曆是唐玄宗時僧一行的名作，玄昉與真備習其推步算法，**淳仁天皇之廢儀鳳曆而採用新的大衍曆，實為玄昉與真備之功**，故同受天皇的寵任，幾乎可以左右當時的政局。真備又於孝謙天平勝寶四年庚寅（唐玄宗天寶九年西元七五〇年）閏三月偕藤原清河再入唐，兩年後真備即籌日本。藤原清河

曾一度歸途遇險。後得脫險返唐，終身仕唐不歸。

聖武天平五年癸酉（唐玄宗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年）四月，榮叡、普照、玄朗、玄法·四僧隨遣唐使多治比廣成、副使中臣名代入唐。天平八年丙子（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西元七三六年）七月舶歸時，僧道鏡偕外籍僧數人歸日本。**道鏡**自幼為僧，學法相宗，又修如意輪法宿曜法；歸日本後，孝謙上皇召為內道場禪師；曾在上皇病中為瞻病人於近江的保良宮，因得上皇信任，勢力漸大，其恃寵干預朝政更甚於昔時的玄昉。藤原仲麻呂之亂平定後，上皇以道鏡為大臣禪師，食寺與大臣等。稱德重祚後，（孝謙再登位後稱為稱德天皇，）道鏡以謀為皇儲未遂，謂「和氣清麻呂其姊法均尼共矯神意欺朝廷」，遂貶放和氣清麻呂，勒令法均尼（俗名廣蟲）還途並流之備後。（且令改狹蟲以尊之。）稱德卒後，光仁天皇乃貶道鏡為造藥師寺別當並流之下野，召還和氣清麻呂及法均尼。

聖武天平八年丙子（唐開元二十四年西元七三六年）唐僧道璿律師齋華嚴疏鈔到日本；又韓國新羅僧審祥，先入唐從賢首學，後天平十二年庚辰（唐開元二十八年西元七四〇年）由南都辨僧正奉聖武旨迎至日本，止大安寺。於是，日本始有華嚴宗。

孝謙天平勝寶六年入辰（唐玄宗天寶十一年西元七五二年）正月，僧鑑真及弟子思託、法進·等一十四人（據宋高僧傳）隨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呂的歸舶到日本。**鑑真**，唐揚州江陽縣淳于氏子，武后長安元年辛丑（西元七〇一年）年十四歲，就智滿禪師出家。中宗神龍元年乙巳（西元七〇五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二年戊申（西元七〇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於長安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受具足戒。觀光兩京，名師陶誘，研極三藏，尤精戒律。旋還淮海，一方宗仰。日本在唐留學的榮叡、普照·兩僧，見唐之律宗大盛，懇請鑑真，赴日本弘法。鑑真允諾，曾渡海五次，均未果，終得附日使歸舶抵達日本。天皇歡迎入城，大寺安止。初於大佛西立戒壇院，為天皇授菩薩戒，次為皇后皇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少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又有皇子一品親田捨宅造招提寺，施水田一百頃。此後十年間（西元七五三——七六三年），長敷律藏，受教者多，號大和尚，**為日本傳戒律的始祖**。於天平寶字七年癸卯（唐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年）端午日圓寂，世壽七十七歲。僧思託著東征傳中有詳述。

孝謙天平寶字八年甲辰（唐代宗廣德二年西元七六四年）藤原仲麻呂之亂平定後，稱德敕造三重小木塔一百萬座，印刷四種陀羅尼經納入塔中，經過六年的時間，於稱德天皇神護景雲四年即光仁天皇寶龜元年庚戌（唐代宗大曆五年西元七七〇年是年八月稱德卒道鏡被貶流）完成。於大安、元興、興福、藥師、東大、西大、法隆、四天王、崇福、弘福·十大寺中，各置此項小塔十萬座。此印刷的陀羅尼經，今僅法隆寺尚存有一部，大約是銅版，**為日本現存印刷物的最古版本**。

桓武延曆二十二年甲申（唐德宗貞宗二十年西元八〇四年）七月，最澄、空海·兩僧偕橘逸勢隨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副使石川道益入唐。橘逸勢為橘逸氏公之弟，在長安遍訪名家就學，能詩文，善隸書，稱為橘秀才；於桓武大同元丙戌（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年）歸日本，終以門閥之故為藤原氏所忌。

最澄在唐受台密禪三宗。於天台受法於佛隴行滿、國清道邃（智顛之七世孫）；

禪則頂戴牛頭法門，依止佛窟遺則，（遺一作惟者誤，）並受法於禪林□然；真言則師事龍興順曉阿闍朵，受三部灌頂密教。

最澄留唐時間頗短（僅八閱月），旋即於桓武延曆二十四年乙酉（唐順宗永貞元年西元八〇五年）偕唐僧義空歸日本，為日本天台宗的高祖，亦即日本台密的開創大師，得桓武天皇的御親任，稱**傳教大師**。著作甚多，凡二百八十餘部。嵯峨弘仁七年丙申（唐憲宗元和十一年西元八一六年）傳教謁四天皇寺聖德太子廟詩：『海內求緣力，歸心聖德宮；我今弘妙法，師教令無窮；兩樹隨春別，三卉應節同；願唯使圓教，加護助興隆。』並有序記云：『今法華聖德太子，是為南岳慧思大師之後身；日本之玄孫興福寺沙門最澄，雖愚，願弘我師教，無任渴仰之心。』傳教大師對聖德太子的崇敬之篤如此。常稱道太所著為「上宮御製之法華疏」或「我大日本的上宮御製」，其留意太子的著作又如此。是則傳教大師弘通法華一乘，實有繼承太子全部精神的意味。太子以攝政的身份定立國民教化的大本，傳教以出家的僧侶擔當佛教弘通的大任，表面上似乎是太子立信者相而傳立國師相，實際上則太子是日本的教主而傳教是太子的教徒。此為日本佛教的教魂所在，研究日本佛教史者不可不知。

傳教大師著作中最可深為感銘的，是其發菩提心記錄的「願文」：『悠悠三界，純苦無安；擾擾四生，唯患不樂。牟尼之日久隱，慈尊之月未照。近三災之危，沒五濁之深。加以，風命難保，露體易消。雖草堂樂無，然老少散曝白骨；雖土室闇迤，而貴賤爭宿魂魄。瞻彼省己，此理必然。仙丸未服，遊魂難留；命通未得，死辰何定。生時不作善，死日成獄薪。得難移移易，為其人身；發難忘易，是其善心。是以法皇牟尼，假大海之針·妙高之線·而喻說人身難得；古王大禹，惜一寸之陰·半寸之暇·而歎乎空過一生。無因得果，無有是處；無善免苦，無有是處。伏思己之行跡，無戒而竊受四事之勞，愚痴而亦成四生之怨。是故，未曾有因緣經云：施者生天，受者入獄。韋提女人之四事供養，表末利夫之之福；貪著利養之五眾之果，顯石女擔輦之罪。明明善惡因果，有慚人誰不信此典耶。然則，徒知苦因而不畏苦果，釋尊所以遮彼闡提；徒得人身而不作善業，聖教所以噴其空手。於是愚中極愚·狂中極狂·塵禿有情·底下之最澄，上違諸佛·中背皇法·下闕孝禮，謹隨迷狂之心發三二之願。以無所得為方便，為無上第一義·發金剛不壞不退之心願：「其一，我自未得六根相似位以還，不出假；其，自未得照理心以還，不才藝；其三，自未得具足淨戒以還，不預檀主法會；其四，自未得般若心以還，不著世間人事緣務除相似位；其五，三際中間所修功德，己身不獨受，普回施有識，悉皆令得無上菩提。」伏願：解脫之味不獨飲，安樂之果不獨證，與法界眾生同登妙覺，與法界眾生同服妙味。若依此力而至六根相似之位，若得五神通時，必不取自度·不證正位·不著一切。願受引導於無作無緣之四弘誓願，周旋法界，遍入六道，淨佛國土成就眾生，盡未來際恒作佛事。』

傳教有鑑於日本南都佛教的弊風，避去都市的腐敗，而創「**山家學生式**」，即比叡山上的「一乘止觀院」所定立的教學精神及其制度，實為山林專修的官學法規。規定「一十二年不出山門」，專心行修。此十二年中：初六年「聞慧為正

思修爲傍」；每日，二分內學，一分外學，長講爲行，法施爲業。後六年「思修爲止·聞慧爲傍」。傳教創密一致說，謂律禪密三宗爲一乘止觀的三面。故其「山家學風」，不是終於單單地多聞，而要在實修一乘止觀，有使其真實取之於自身的意圖；以示佛道不在乎知識的所有而在乎智慧的心證，故有此住山十二年的必然要求。傳教所著「顯戒論」下卷中有其說明：『謹案：蘇悉地羯羅經中卷云：「若作持念持，經一十二年，縱有重罪，亦皆成就。雖法不具足，皆得成就。」明白可知，雖最下鈍者，經十二年，必得一驗。常轉常講，期二六歲；念誦護摩，限十二年。然則佛法有靈驗·國家得安寧。』由此可見「山家學生式」的目的在高深教，育，此與傳教「從佛法向世間」的教學流布方向（詳下文）是一致的。

空海，二十歲時（延曆十二年丁丑唐德宗貞元十三年西元七九七年）於和泉國槇尾山寺從勤操僧都得度，初名教海，後改如空；二十二歲時受具足戒於東大寺戒壇院，始改名空海。三十一歲入唐求學。在唐時，就青龍寺惠果阿闍梨傳受密法，纔三年而惠果歿。於桓武大同元年丙戌（唐憲宗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年）偕橘逸勢歸日本，住居高尾山，弘通密教，**遂開日本所謂東密一派**，得嵯峨天皇的御皈依，稱**弘法大師**。仁明承和四年丁巳（唐文宗開成二年西元八三七年）圓寂，世壽六十歲。

弘法對於傳教爲後進，而在唐修學時間較久於傳教，故於佛學的造詣亦深，以傳教有謙虛共學的心懷而弘法即爲其忘臘交。兩師相繼而鞏固「護國佛教」的基礎，實爲日本佛教史上極堪留意之事。

但是，傳教弘法兩大師教學流布方向却不相同：傳教取「從佛法向世間」的方向，常先行精求佛教的真意義，而後依據之以利他教化，並願與古京佛門碩德共同貢獻於國家社會。弘法取「從世間向佛法」的方向，以爲五乘佛法無所不包，種種思想悉是佛教的梯程，故常由批判而攝納而綜合，由儒教經道教而佛教，一旦達於佛教時，則道教儒教悉皆包括在佛教部內而共同貢獻於世道人心。（說詳其所著三教指歸。）

傳教弘法兩大師教學流布的方向既異，故其教學方式亦不相同。傳教創「山家學生式」，已如前述。弘法則創「**綜藝種智院式**」，即東寺附近的「綜藝種智院」所定立的設立趣旨。其院名則有取於大日經「初阿闍梨兼綜眾藝」與大般若經「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的經文而來，以佛學爲主而兼授儒學，實爲一助成有志求學者的理想私學。其答客難曰：『大唐之城，坊置閭塾，普教童稚；縣開鄉學，廣導青衿。是故才子滿城，藝士盈國。今是華城中，但有一大學，而無閭塾。是故貧賤子弟，問津無處；遠方好處，往返多疲。今建此一院，而普濟童蒙，不亦善耶。』由此可見「綜藝種智院院式」的目的是在普及教育，此與弘法「從世間向佛法」的教學流布方向是一致的。

弘法的著作中，「**即身成佛義**」一書可稱爲代表作。其卷初揭一偈以「體·相·用」顯真言的教義，以示真言教學的大綱：『六大無礙常瑜伽（體），四種曼荼各不離（相），三密加持疾顯（用），重重帝網名即身（無礙）。』弘法依據密教經典以解說「六大無礙常瑜伽」的體大白：『密教經文，皆以六大（地水火風空識）爲能生，以四法身（自性法身受用法身變化法等流法身）三世間（器世間眾生世間智正覺世間）

爲所生。此所生之法，上達法身，下及六道，雖有精細大小之差，然猶不出六大。故佛說六大爲法界體性。諸顯教中，以四大等爲非情；密教則說此爲如來之三摩耶（三摩耶，此云平等）身。四大等不離心大，心色雖異，其性則同。色即心，心即色，無障無礙。智即境，境即智；智即理，理即智。無礙自在。雖有能所之二，而絕能所。法爾道理，有何造作？能所等名，皆是密號。不可執常途淺略之義，而作種種戲論。如是六大法界體性所成之身，無障無礙而互相相應涉入，常住不變而同住實際。故頌曰「六大無礙常瑜伽」。無礙者，涉入自在之義。常者，不動不壞等義。瑜伽者，翻云相應。相應涉入，即是「即」之義。』六大無礙有即身之體大，隨之而四種曼荼羅有即身之相大。相大者，大乘起信論所謂「如來藏本具足無量無邊性功德故」者是。

「即身成佛義」中，先根據大日經「一切如來有三種秘密身，謂字、印、形像」之說，更依金剛頂經詳說四曼。『云何四曼？（「曼荼羅」係 Mnadala 之對音，爲攢搖牛酪成酥之義，因之稱教義之心髓精粹者，一般譯作「圓輪具足」，有「隱顯俱成·微妙莊嚴」如華嚴經十玄緣起所說之意味，其內面之所見者則爲功德具足之表現云。）一者，大曼荼羅，即大智印，爲一一佛菩薩之相好身，又或爲其綵畫形像。（密教以爲一切萬象悉是佛菩薩之相好身，故天地萬物之自體形色悉是大曼荼羅。）二者，三摩耶曼荼羅，即三摩耶智印，有所持之幟幟刀劍輪寶金剛蓮華等類，或亦有其畫像。（覺濟迷悟鈔云：「總廣言之，國土器界之方圓長短之形，悉是三摩耶曼荼羅。」故由其內在道理一面所見者，則爲三摩耶曼荼羅。）三者，法曼荼羅，即法智印，爲本尊之種子真言，或書寫其子字各各本位，又有法身之三摩地（舊作三昧此云靜止）及一切契經之文義。（由於表示之「聲」「字」而見者，如松濤（風聲）岸浪（水音），則爲水曼荼羅。弘法大師之聲字實相義云：『如來之說法，必藉文字；文字之所在，六塵其體也；六塵之本，法佛之三密即是。』又云：『名教之興，非聲字不成，聲字分明而實相顯，所謂「聲字實相」，即是法佛平等之三密，眾生本有之曼荼羅也。』此即其「聲」「字」「實相」三者一如之論證也。）四者，羯磨曼荼羅，即羯磨智印，爲諸佛菩薩之種種盛儀事業，又或鑄或捏等。（山川草木之動靜屈伸，由其種種妙用方所見者，則爲羯磨曼荼羅。）如是四曼荼羅（四種智印），其數無量。一一之量，同於虛空，彼不離此，此不離彼，猶如空光之無礙而不逆，故曰「四種曼荼各不離」。不離即是「即」之義。三密加持，有即身之用大，爲真密教的中心，弘法在「即身成佛義」中解說曰：『三密云者，一者身密，二者語密，三者心密。法佛之三密，（一切身等，一切語言音聲等於意，皆遍法界，是爲法佛平等之三密，）甚深微細，等覺十地亦不能見聞，故曰密。一一尊等具刹塵三密，而互相加入，彼此攝持。眾生之三密亦復如是。此眾生之三密，與法佛的三密相應，故名三密加持。若有真言行者，觀察此義，手作契印，口誦真言，心住三摩地（止），則因三密相應而加持之故，早得大悉地。（悉地者，成就；指作業成就或妙果成就；亦云成菩提。）若有人不闕法則，晝夜精進，則現身獲得五神通；漸次修練，則不捨此身而進入佛位；具如經說。依於此義，故曰「三密加持速疾顯」。加持云者，表示如來之大悲與眾生之信心。佛曰之影現於眾生之心水，曰加；行者之心水能感佛日，名持。（佛的大圓鏡智之光明在世人思想中，謂之加；世人思想能感受佛智的光明，謂之持。）行者若能觀念此理趣，則因三密相應之故，現身證得速疾顯現本有之三身；故名「速疾顯」。

「即」，如平常之即時即日，即身之義亦如是。』偈末一句，結明重重無礙之「即」。帝網，即帝釋天之寶網，其網線上，珠玉交絡，光明互相涉入，一一珠玉中各各現諸珠玉影，交映互彰，重重無盡；而又涉入自在，各各無礙。今乃借此以喻諸法一一之即入亦復如是，塵塵法法，重重無盡，而互相即入自在，盡顯事事礙法界矣。華嚴宗之因陀羅網法界門，與此所說正同。就本偈全文而總言之：皆所以說明即身成佛之「即」。因弘法是日本東密的開創大師，故錄此偈並摘其要義為釋，以便窺其一斑。（余又另寫密教即身成佛偈略釋及即身成佛偈釋後記之詳之。）

日本著名的「依呂波」歌，用中國的大草書（日本稱平假名）四十七字為字母，譯大般涅槃經雪山全偈四句的意義。（涅槃經梵文四十七字實為中國唐時三十六字母所取法，日本遂亦仿之以創字母。）此歌即是弘法大師所作。後遂依據音韻學的排列而演為「五十音圖」。（亦弘法作，或謂吉備真備作。）當時佛教講經說法之風極盛，筆記者感覺用漢字音訓交雜寫日語的不便，初將漢字省略而創自己私用的符號，以圖寫抄的便利，漸次流布，遂創成全國通用的「片假名」。總而言之，音韻反切之學，自佛教傳入中國後而始大備；日文的字母，亦都是出於唐時佛學者流。

傳教弘法兩大師教學流布的方向以及教學方式雖不相同，但兩大師一致推崇聖武朝法相宗僧行基所創所創的「神佛同體說」，更進一步而成為「本地垂跡說」。此說以為佛陀是神（日本固有之神）的本體，神是佛陀在土所垂之跡；顯係出於天台宗的法華疏暨密宗的說法。在昔創自行基，已如前述，今則傳教與弘法集其大成。傳教祀大物主神於比叡山寺，稱為山王。弘法建立剛峰寺於丹生都姬之神地，又以佛傳會於諸神，或稱菩薩或稱權現。於是神官樂於助長其說，而朝野群疑盡釋。從此以後，神佛已混而不可分，所謂「兩部神道」即指此而言。後世日本佛教徒，有稱基督教的聖母為瑪麗亞觀音者，其思想實即由此影響而來。

唐僧義空禪師，在唐師事鹽官齊安，傳受南宗禪之奧旨，為其上首。於桓武延曆二十四年乙酉（唐順宗永貞元年西元八〇五年）偕最澄到日本。嵯峨天皇時代，為檀林寺開山，傳禪，但當時日本人皈依參禪者不多。居數歲後，仍歸唐。

仁明承和五年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西元八三八年）七月，常曉、戒明、義澄、圓仁、惟正、仁好等僧隨大使籙原常嗣副使小野篁入唐。**圓仁**姓任申氏，桓武延曆十三年甲戌（唐德宗貞元十年西元七九四年）生於下野都賀群，為最澄之嗣資。在唐禮五台山，逢志遠法師，寫得台家諸書；又就元政阿闍梨義真阿闍梨暨玄法寺法全阿闍梨等傳受兩部曼荼羅大法；又就智者八代高弟醴泉寺宗穎受止觀；住長安六年，於唐；武宗會昌中偕惟正歸日本。壽七十一歲圓寂。敕諡慈覺。

圓珍為空海之姪，文德仁壽三年癸酉（唐宣宗大中七年西元八五三年）入唐，在福州開元寺就般若多羅三藏習梵字，旋上天台山研究台宗的章疏，後入長安遇青龍寺傳教和尚暨長生殿持念大德法全阿闍梨傳受兩部密旨，並受義真付灌頂稱傳法阿闍。文德天市二年戊寅（唐宣宗大中十二年西元八五八年）歸日本，**與圓仁同弘天台真言兩宗**。字多寬平三年辛亥（唐昭宗大順二年西元八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圓寂，壽七十八歲，法臘五十九，敕諡智證。

唐懿宗咸通六年乙酉（清和天皇貞觀七年西元八六五年）釋宗叡由唐返日本，齋回經

論章疏百餘卷。

綜上所述，日本佛教，在奈良朝（元明天皇至桓武天皇延曆三年甲子西元七一〇——七八四年）為三論法相兩宗極盛時代，稱為都市佛教，寺院在政治中心地點，僧侶的戒行漸弛，遂致有墮落的傾向。在平安朝（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甲戌至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壬子西元七九四——一一九二年）為天台真言兩宗極盛時代，稱為山林佛教，寺院在山嶽幽靜地點，注重戒律行持，專心研究佛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為傳教弘法兩大師補偏救弊之道。其實，普度利生的活動，仍須不忘自己身心的修持，此纔是佛教全貌而不致有墮落之虞。尤其是要修大乘的初發心菩薩，更須朝乾夕惕地以此為鑑。

中國五代時期，（西元九〇七——九六〇年，）日本僧侶來到中國的人數不多，皆乘吳越商船往來。（當時籙原氏無意於中國交通，故無日本船來中國，但亦不禁止中國商船的前往通商。）史籍可稽者，始於後梁，即日本醍醐天皇時代。（西元十世紀之初。）此期日僧之來中國，多數為拜謁夕巳而並非求法。當時越錢王保境安民，崇奉佛教，兩浙十三州的寺刹林立，杭州蘇州成為佛教的中心，明州（寧波以及普陀）以通商港口所在而佛教亦盛，天台山則為天台宗的根本道場，故日僧來中國，當然先到吳越。

醍醐天皇延長四年丙戌（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吳越武肅王錢鏐寶正元年吳睿帝楊溥順義六年西元九二六年）日本興隆寺僧寬健入中國巡禮寺觀，携來管道真、紀谷長雄、橘廣相、（奈良麻呂的玄孫、）都良相等人的詩及小野道風的行草各一卷，流布於中國。

雀天皇天慶元年戊戌（後晉石敬瑭天三夫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六年南唐徐知誥昇元二年西元九三八年）日本延曆寺僧日延入中國，遍遊吳越諸地，參拜天台山。村上天皇天曆二年戊申（後漢劉知遠乾祐元年吳越忠懿王錢弘俶二年南唐李璟保大六年西元九四八年）日延歸日本，携回吳越王的「寶篋印塔」。吳越王倣印度阿育王故事，作八萬四千座小塔，內藏寶篋印陀羅尼經，頒行各地。日延得之，携回日本。筑前大泉坊、山城金胎寺、河內金剛寺，各有一座，近世在紀州那智出土一座，現存者計共五座。

冷泉天皇安和元年戊辰（宋太祖開寶元年西元九六八年）東大寺的僧侶，以莊園所有權問題，與興福寺僧侶交戰。初，平安時代，皇室貴族皆奉佛教，白河、鳥羽，兩天皇信佛尤篤，此外皇族攝（政）關（白）之出家者亦多。因此，佛教漸趨於貴族化，寺院勢力直與當時的貴族並駕齊驅。自莊園制興起後，各大寺院亦如貴族一樣，各自擁有廣大的莊園。當時院勢力最大者，有延曆寺、興福寺、高野山、園城、東大寺等，均領有莊園，擁有巨富。各寺院乃於寺內設備武器，訓練武藝，以便自衛。此種習武之僧侶，事實上已成寺院的武士，亦即寺院各擁有其武力。又寺院附近，更有由寺院領導的莊園，此等莊園又各以武士自衛，於是各寺院的武力日益膨脹，寺院與寺院之間遂不免時生突。所謂僧兵，即是此等墮落惡僧，遂成為當時破壞秩序擾亂社會的惡勢力。當時鬧得最兇者，為興福寺、比叡山、東大寺；至是（西元九六八年）乃有僧兵互戰事件。嗣後，僧兵戰爭頻發不已，在堀河康和二年庚辰至高倉治承四年庚子（宋哲宗元符三年至宋孝宗淳熙七年西元一一〇〇——一八〇年）的八十年之間，僅延曆寺方面，即發生十四次之多。官軍不知所措，朝廷更苦於應付。白河上皇曾對此而歎曰：『朕所不稱意者，鴨河之水（即加茂江的波

浪)雙陸之采(即賭博的骰子)及山法師耳。』由此可見當時比叡山僧兵猖獗的一斑，在日本佛教史上已稱之為末法亂世矣。源氏平氏爭霸之戰，僧兵曾為源氏的同盟者，故通中古時代屹然存在。迨「**一向一揆**」事件以後，經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之先後努力，僧兵勢力始被消滅。(另詳後文一向宗下。)

高倉天皇仁安三年戊子(南宋孝宗乾道四年西元一一六八年)日僧**明菴榮西**入宋，時年二十八歲，居天台半年，携天台宗的新章疏三十部歸日本。榮西並帶回茶的種子，贈與京都拇尾的明惠上人，培植於拇尾山中。榮西又著喫茶養生記，禪宗認為喫茶可以修身養性，「趙州茶」的故事又格外動人，故禪宗盛而喫茶之風亦盛。後鳥羽天皇文治三年丁未(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西元一一八七年)榮西再入宋，時年四十七歲，天台萬年寺龍派虛菴懷敞得受臨濟宗正風，宋孝宗賜號千光法師，為臨濟義玄十六世法孫。後鳥羽建久二年辛亥(南宋光宗紹熙二年西元一一九一年)榮西再歸日本，在博多建聖福寺；又依鎌倉幕府賴朝大將軍之妻政子的意願，在鎌倉建壽福寺；又依賴家將軍的意願，在京都建建仁寺；傳臨濟宗，鼓吹禪風，因而禪日盛。白河法皇恐南都北嶺諸宗之被抑於禪，遂下院宣制止，榮西乃著「興禪護國論」三卷以答之。其他著作，尚有出家大綱一卷，喫茶養生記一卷。後以監造東大寺及法勝寺重塔有功，任為權僧正。順德天皇建保三年乙亥(南宋寧宗嘉定八年西元一二一五年)圓寂於鎌倉壽福寺，壽七十五歲。

道元禪師，京都人，以追慕亡母，觀香火之煙而密悟無常，(佛教定石的無常觀)遂於八歲時之冬(土御門承元元年丁卯南宋寧宗開禧三年西元一二〇七年)出家。十三歲時之春，到叡山之麓而入良觀法眼之室。又於榮西執弟子禮。後於後堀河貞應二年癸未(南宋寧宗嘉定十六年西元一二二三年)偕其弟子明全宋，呈手記(中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時不待人·去聖必悔」等語)參學於曹洞宗第十三代天童長翁如淨禪師而得心印。後堀河安貞元年丁亥(南宋理宗寶慶三年西元一二二七年)道元歸如本，時年二十九歲。歸後，初居建仁寺，繼居宇治興聖寺，後住越州永平寺，傳曹洞宗，為洞山良价十四代法孫。著有普勸坐禪儀一卷，正法眼藏九十五卷。禪宗號稱「教外別傳·不立文字」，重精神的修養而不重經典的研究；禪僧寡欲素朴，不望富貴，而重尚氣節，故與當時質簡的武人適相投合。後深草建長五年癸丑(南宋理宗寶祐元年西元一二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圓寂，壽五十四歲。敕諡佛性傳東國師，加諡承陽大師號(道元之後，由懷奘、徹通、瑩山(西元一二六八——一三二五年)相承而成。)

鎌倉幕府源氏三代將軍的開創者賴朝(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壬子至土御門天皇正治元年(即建久十年改元)己未南宋光宗紹熙三年至宋寧慶元五年西元一一九二——一九九年)兼有漢高魏武之風，但朝廷所設官職，並不因幕府而廢置，任命之權在皇室，幕府家臣的任命則不經奏請的手續，其家臣亦不許兼任朝廷官職，總算還是能尊崇皇室的。賴朝素崇神佛，盡力營造神社佛閣，奉獻土地金帛，禮遇僧侶，參拜奈良東大寺大佛。(東大寺於高倉天皇治承四年即西元一一八〇年焚於平氏，經賴朝修復。僧重源出宋傳天竺樣佛殿圖，宋人陳和卿應招鑄佛。)其妻政子亦崇佛，後鳥羽建久六年乙卯(南宋寧宗慶元元年西元一一九五年)三月，曾率子賴家赴奈良參加東大寺的齋會。賴家是第二代，(土御門天皇正治元年己未至土御門建仁三年癸亥南宋寧宗慶元五年至嘉泰三年西元一一九九——一二〇三年，)其母

政子握幕府實權，政子有識量，賴朝死後即削髮爲尼，而聽政如故，世稱尼將軍，亦稱二位尼。（因敍官從二位。）實朝即賴家之弟千幡，是第三個將軍，（土御門建仁三年癸亥至順德天皇承久元年己卯南宋寧宗嘉泰三年至嘉定十二年西元一二〇三——一二一九年，）嘗得一個怪夢：『夢夜入宋至某寺，觀長老陞座說法。實朝問其時在座聽講僧侶以寺名，僧曰，此乃京都之能仁寺。又問此長老爲誰，答曰，此寺之開山南山宣律師也。又問曰，宣律師圓寂已多年，何今尙存？答曰，汝所不知，聖者難測，生死無隔，可隨處現；律師現再誕，即日本國實朝大將是也。又問侍者爲誰，曰，侍者亦再誕，即日本國鎌倉下雪之供僧良真僧都是也。實朝於夢中問答數刻而醒。』實朝醒後遣使往招良真，適良真亦作同樣之夢，正在來謁實朝途中，與使相遇，偕謁實朝，良真先告以夢中之事，實朝以兩夢相合，遂以此怪夢因緣而自信爲南山道宣後身。東大寺大佛工宋人陳和卿又投其所好，說再誕權化以諛實朝。實朝屢思入宋親謁其靈跡，終未果行，僅遣良真代表入宋施金銀貸財於南宋師（杭州）之能仁寺。

自五代以迄宋朝末季，日本與中國間的聘使中絕，僅僧侶與商賈仍舊往來，已如上述。日僧入宋者，與五代時期不同，已非單單爲拜謁名山，名在江南禪寺學禪而歸。當時禪僧，學問優秀，深通中國情形，故多爲幕府的政治外交顧問。迨元朝勃興，在日本正是鎌倉幕府的執政者北條氏當權之時。**宋僧蘭溪道隆禪師**，聞日本禪宗甚盛，乃於南宋理宗淳祐六年丙午（後嵯峨寬元四年西元一二四六年）偕其弟子紹仁、龍江等赴日本，北條時賴招至鎌倉，仿中國徑山萬壽寺樣（亦稱禪宗樣）建建長寺，道隆遂爲鎌倉建長寺開山。條時宗又常就道隆參禪。後宇多弘安元年戊寅（南宋端宗景炎三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西元一二七八年）道隆圓寂，謚大覺禪師。

因建長寺缺席，北條時宗德詮宗英兩僧，携其親筆請帖入宋，請祖先禪師赴日本。**祖元**字子元，號無學，宋慶元府人，年十四至杭州徑山參佛鑑，年十七有所省悟。佛鑑圓寂後，即遍歷諸方。年三十六，了然大悟，更無餘蘊。住持天台山真如寺，居七載，以元軍侵擾，去至溫州雁蕩，元軍壓溫境，眾皆逃散，獨祖元泰然兀坐，元軍欲加刃，祖元不動，從容口述一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裡斬春風。』元軍感動而去。其鎮定如此。翌年，還天台山。至是，受請，於後宇多弘安二年己卯（南宋後幼帝祥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西元一二七九年）就住建長寺。弘安四年辛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西元一二八一年）夏，元軍東征日本，如潮湧至肥前筑紫的海上時，北條時宗心境沈重，親自血書諸經請師祈禱，祖元對時宗曰：『一句一偈，一字一畫，悉化爲神兵，如帝釋天與阿修羅之戰，我軍得神佛的庇護，降伏魔軍，生靈皆安。』其安定人心，激發大無畏精神的苦心，於此可見。是役也，元軍以颶風破舟，戰不利，喪師十之七八，僅約三萬人得還。時宗於國家危急之秋，鎮定一如平日，飛報頻來，若無其事，媲美於中國東晉的謝安，此種偉大的修養，實得之於禪宗道隆祖元兩師的薰陶。弘安五年壬午（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西元一二八二年）時宗又依禪宗樣創建圓覺寺，請祖元爲其開山第一祖。弘安九年丙戌（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西元一二八六年）九月三日圓寂，壽六十一歲，謚佛光國師。

日本佛教，奈良朝盛行者有三論、法相、華嚴、律、成實、俱舍，所謂南都六宗；平安朝盛行天台真言兩宗，故增為八宗；至鎌倉幕府時代又盛行禪、淨土·兩宗而增為十宗；旋又析禪為臨濟曹洞兩宗；其後又有別創的時宗、一向宗（淨土真宗）、日蓮宗（法華宗）·而共增為十二宗。

諸宗中，其影響最大的是禪宗。當時恰當南宋之亡，不甘附元的宋僧，相繼東渡日本，宋元文化亦隨禪宗而傳來。降及明末，不甘附清的明清，又相繼東渡日本，明代文化又隨禪宗以俱來。於是，不但是臨濟兒孫滿東瀛，洞上一宗亦以日本為特盛。（黃檗宗的崛起在後。）後世隔代既遠，數典忘祖，常直稱其家派曰「臨濟宗」「曹洞宗」，分門別立，而不欲共以「禪」字統稱其宗，在黃檗宗成於日本以後為尤然。

一玄案：佛法只有一個，而有教下宗下之分；禪宗只有一個，而有南頓北漸之別；南禪只有一個，而有五家分燈之稱。五家雖作略不同，而仍歸一禪一佛法。究竟臨濟曹洞兩家異在何處？古德北宋五祖演禪有其開示：『問如何是臨濟下事？演曰：五逆聞雷。』天隱修禪師釋為「怒雷掩耳」，虛大師釋為「驚絕」。『問如何是曹洞下事？演曰：馳書亦不到家。』天隱修禪師釋為「萬派朝源」，虛大師釋為「回互」。演又曰：『會，即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見法演禪師語錄及純一休狂雲集。）近時代的門戶矜爭，不但離開了作略上的師法問題，簡直參雜了世俗上的自私意氣。會禪不會禪？是佛法不是佛法？早就被演和尚一句說煞。

弘安之役以後，元日間的關係頗為險惡，但兩國間的商務仍未全絕，日本西部的豪族多有私遣船舶與元交易而獲厚利者。元成宗大德三年己亥。（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西元一二九九年）三月，元遣僧一寧與僧子曇使於日本，十月抵鎌倉。北條貞時拒之，禁錮之於伊豆，後聞有其碩德，釋之，使居建長寺。

延元四年己卯（元順帝至元五年西元一三三九年）後醍醐天皇以被足利尊氏所放逐而走死於吉野後，足利尊氏靜夜反省深自咎責，國師夢窗疎石又誨以無得皆空之般若思想，乃懇切請得北朝光明上皇的許可，**籌建天龍資聖禪寺**（簡稱天龍寺）於京都之嵯峨，為後醍醐祈禱冥福以表示懺悔，以高師直為工事奉行，夢窗疎石為開山。因建築費無所出，乃在幕府保護之下，派遣「天龍寺船」，於後村上興國三年壬午（元順帝至正二年西元一三四二年）起，入元往返貿易，與其他商船無異，每次歸國後負納錢五千貫於天龍寺的義務。至興國六年乙酉（元順帝至正五年西元一三四五年）如竣工。

文和三年甲午（元順帝至正十四年西元一三五四年）正月至三月共三個月之短時日間，由鎌倉、京都、奈都、奈良·以及真言宗等六十個寺，集合僧侶數百人，**從事般若經乃至一切經書寫之事業**，足利尊氏親督其事，以祈後醍醐天皇冥福而為深自懺悔之又一表示。此**尊氏經文願文**云：『願書藏經功德力，世生生聞正法，頓悟無上菩提心，登佛果位酬聖德。後醍醐院證真常，考妣二親成正覺，元弘以後戰亡魂，一切怨親悉超度。——文和三年甲午歲正月廿三日，征夷大將軍正二位源朝臣尊氏謹誌。』文中尊氏二字為親筆署名。據此，可知佛教之啓發尊氏寬宏精神者實非淺鮮也。此後四年（元順帝至正十八年戊戌西元一三五八年）足利尊氏卒。

高師直，在日本史上都憎惡之；戲曲「忠臣藏」中，竹田出雲等更與以極度惡人化之形容。實則因其資性倨傲貪婪驕淫奢侈，不免任性恣行，但尚非大惡。其所開版之宋代子璿十卷「首楞嚴義疏注經」，（分割經文及註疏會合本，）最為喧傳有名。對尊氏經而言，推稱師直版。此**師直版之願文**云：『師直熟思，今生愆尤不可勝計，矧是曠劫罪障，何以消除。因茲謹開此真詮之版，以拔積業之根，所冀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同出妄想昏域，共入楞嚴覺場。——曆應二禩季春中澣，武藏守高師直敬誌。』讀此，亦可同樣知其如何表達切實自懺之誠意矣。

禪宗盛行於上流社會，足利氏世代崇奉禪宗，尊氏建天龍寺，義滿建相國寺，（在京都上京區，自長慶弘和二年辛酉即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西元一三八一年起興建，至元中三年丙寅即洪武十九年西元一三八六年竣工，春屋妙葩讓開山祖於其師夢窗疎石而自為第二祖，）皆以奉禪宗。一時名僧輩出，而夢窗疎石其弟子春屋妙葩（普明國師）為最有名。

中國南宋寧宗時，仿印度五精舍（鹿苑、祇園、竹林、大林、那爛陀）故事，定有禪院五山。（徑山即杭州興聖萬壽禪寺·靈隱即杭州景德靈隱禪寺·淨慈即杭州報恩光孝禪寺·天童即寧波景德禪寺·育王即寧波廣利禪寺。）日本鎌倉時代以來，留學於宋元兩朝的禪僧多達二百餘人，於是五山十刹之制又傳到日本。北條時賴當權時，以建長、建仁、東福、萬壽、圓覺·五寺（皆臨濟宗）列為五山。後醍醐天皇敕改禪院等級，（後醍醐建武元年甲戌元順帝統二年西元一三三四年，）以京都的南禪、大德·兩寺為日本第一山，位在上述五山之上。北朝曆應年中，將京都鎌倉兩地的禪寺合併而定五山的位次：第一，建長寺（鎌倉）南禪寺（京都）；第二，圓覺寺（鎌倉）天龍寺（京都）；第三，壽福寺（鎌倉）；第四，建仁寺（京都）；第五，東福寺（京都）。元中三年丙寅即北朝至德三年（明太祖洪武十九年西元一三八六年）始有京都五山與鎌倉五山相對，而以京都南禪寺位於五山之上，如次表：

	（京都）	（鎌倉）
五山之上	南禪寺	
五山第一	天龍寺	建長寺
五山第二	相國寺	圓覺寺
五山第三	建仁寺	壽福寺
五山第四	東福寺	淨智寺
五山第五	萬壽寺	淨妙寺

此外，又規定尼寺五山，（五□景愛寺、五□南護念寺、萬野郡檀林寺、萬野郡惠林寺、五□通玄寺，）均在京都近郊。五山之外，又有十刹，（鎌倉淨妙寺、鎌倉禪興寺、京都聖福寺、京都萬壽寺、鎌倉東勝寺、鎌倉萬壽寺、上野長樂寺、京都真如寺、京都安國寺、豐後萬壽寺，）其後又有京都十刹與鎌倉十刹之分。

五山禪僧，多留學中國十年乃至二十年者，生活完全中國化，除修禪辦道外，兼研經史詩文，故五山文學（純為漢文學）較平安時代的漢文學更為進步。五山文學可分為前後二期，前為詩文時期，後為註疏時期。東福寺的虎關師鍊著有濟北集、元亨釋書，建仁寺的雪村友梅著有岷嶺集，又中巖圓月著有東海一漚集，天龍寺的絕海中津著有蕉堅集，南寺的善堂周信著有空華集。而**夢窗疎石**之於文學

則集其大成。佛教經典印刷事業，自鎌倉時代以來已有奈良興福寺的春日版、東大寺版、西大寺版，以及高野山的高野版，但皆屬各種單行經本，並不普及。五山對文化的普及，貢獻較大，概由京都鎌倉的五山及其同一系統的禪寺發行，故世稱五山版；而**春屋妙葩**在京都嵯峨的臨川寺所雕刻印行之書既多且精，特稱之為**臨川寺版**。此外，美術方面，禪僧早傳宋元的畫風，瀟灑澹淡。如：義持時，東福寺的明兆，擅長佛畫，筆力雄渾，為世所重；相國寺的如拙、周文，均學宋元畫風，長於山水花鳥。義政時，僧雪舟自明歸日本，住周防之雲谷庵，其墨繪山水稱古今獨步，世稱**雲谷派**。

長慶天皇建德二年辛亥（明太祖洪武四年西元一三七一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南朝九州征西府征西將軍良懷親王，遣僧祖朝來入明京獻表貢物，送還在明州台州沿海所掠的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明太祖初以為良懷親王即是日本國王，及與征西府往還交涉，請禁倭寇，始知日本京都尚有北朝。太祖乃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僧祖朝歸日本，並兼圖直接與京都的北朝交涉，請一體禁止倭寇。祖闡等於長慶文中二年癸丑（明洪武六年西元一三七三年）果到京都，其與北朝天皇及室町幕府的交涉情形則不得而知，滯留二月而歸明。此時又有日僧如瑤助明左丞相胡惟庸謀變之嫌，故明與日本兩國間的關係尚未融洽。後小松應永八年辛巳（明惠帝建文三年西元一四〇一年）筑前商人肥富自明歸日本，向義滿將軍說日本與明兩國恢復國交之利。義滿乃遣肥富、祖阿，為正副使入明。翌年，肥富歸日本，携回明惠帝所賜國書及所頒大統曆，**義滿**（源道義）**受封為日本國王**；明成祖永樂元年癸未（西元一四〇三年）又受金印。因義滿的親明，而倭寇（海盜）亦曾一度絕跡。義滿一代，遣使入明凡六次，在遣明使中最堪注意之點，為正副使多自京都五山的僧侶中選任。京都五山，如上所述，原與室町幕府有其特殊的關係，其僧侶既長於漢學文辭，多有兼任幕府書之事，又以通達明朝國情，故適於為足利將軍的使節。

此時，朝鮮（即今之韓國）的印刷術已有進步，仿宋雕版方法印刷大藏經。於蜀版（舊宋本五〇四八卷，開版年代為北宋太祖開寶四年辛未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癸未，西元九七一一—一九八三年）之後有五九二四卷的**高麗藏初雕版**，（朝鮮顯宗二年辛亥至文宗末年壬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至神宗元豐五年西元一〇一一——一〇八二年，）於東禪寺版（福州本六四三四卷，開版年代為北宋神宗元豐三年庚申至徽宗崇寧三年甲申西元一〇八〇——一〇四年）開元寺版（福州本六一一七卷，開版年代為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至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辛未西元一一一二——一一五一年）思深版（宋本五九一八卷，開版年代為南宋高宗紹興二年壬子西元一一三二年之頃）之後有六五五七卷的**高麗藏再雕版**。（朝鮮高宗二十三年丙申至高宗三十八年辛亥宋理宗端平三年至理宗淳祐十一年，西元一二三六——一二五一年）日本聞之，室町幕府遣使向朝鮮求大藏經，於是**高麗版的大藏經傳到日本**，今日本南禪寺、建仁寺、增上寺日光山等大寺大社均尚保存有此種版本。

佛學高深，不易為一般民眾所了解，尤以武人缺乏學識素養，難於接受高深教理與形式主義的宗教，而要求簡易通俗與普及平民的宗教，於是有淨土宗、淨土真宗（一向宗）、日蓮宗，時宗等宗派的興起或別創。

初，日僧**良忍**，捨叡山的講學而隱遁於大原之來迎院，專修念佛，對阿彌陀

直授之偈有簡單的領解，為日本融通念佛宗的開祖。所謂阿彌陀直授偈，即：『一人一切人，一切人一人；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是名他力往生。十界一念融通念佛，億百萬遍功德圓滿。』良忍的領解，則為：『諸法實相，無能念，無所念，如如融通，是名他力往生之願；諸法實相，生佛宛然，如如融通，是他力往生之行；億百萬遍非多非少，是名事理不二不可思議功德往生日課。一念懈怠，寶池蓮萎，億百萬遍天德損減；一念精進，寶池蓮開，億百萬遍功德成就。』往生的願行，畢竟不離諸法實相，既無能念所念，故西方之願即可作為「十方法界淨土」來領會。於生佛宛然如如融通之上有往生之行，故念稱彌陀即可作為「明己心之面目」來領會。是以淨土教的原理，却是無求於諸法實相以外。基此以觀良忍所說，是純粹天台流的念佛。其後，日僧**源信**的教學，較良忍所說更為徹底。謂：『念佛與諸法實相歸一，求佛道願往生融會。』繼承唐善導的思想而說彌陀本願，一方面使出家修道者反省，一方面使在家修福者警覺。於此，繼承源信之精神而以演進於純粹方式出現者，則有日僧**源空**。源空初學天台教，又受密教及圓頓大戒，後見唐淨土宗善導所著「觀無量壽經疏」，遂捨所習，專門念佛，號**法然上人**。其純依善導專修淨土一點，可謂超越源信，故為**日本淨土宗的開祖**。其著作，有「選擇本願念佛集」。法然對於源信的態度，實有因為理解源信而不可不超越源信之風。以歷史的關係觀之，兩師間洵有此必然演變的意味。

考法然上人之時代，為源平鬥爭最極殺伐之中，朝榮源氏，夕榮平家，而北條氏更代源氏，無常之世相著明，人心之動搖極度，上下惶惶，哀愁戰慄，無不自覺人生之不可恃，群以「祇園精舍之鐘聲·沙羅隻樹之花色·湛諸行無常之響·顯盛者必衰之理」等為謳，而奏至憐之悲曲。處此當代逼迫之際，如平安朝代法華經之信仰，由佛陀慈誨之「諸法實相」「佛性開覺」等問題，却已不能滿足普遍群眾之要求。方此時也，他力本願之阿彌阿佛之救濟，恰獲群認為普潤枯渴心田之慈雨。於是，法然上人之草庵，遂見聞法者之雲集而門前若市矣。

法然之弟子**親鸞**，法名綽空，（係慕北魏曇鸞與唐道綽而取名，）亦以歷史演變的關係而別創**淨土真宗**（一向宗），為其開祖，自稱愚禿親鸞，謚見真大師。大乘義章有「辨此實性故曰真宗」一語，淨土真宗的取義即在。親鸞傳法然之真髓，得其精神，更能鮮活開示，而宣揚透徹的絕對他力之妙理。人心之歸仰，實亦僅僅以此妙理。說者謂「無法然則親鸞不出，無親鸞則法然不顯」，洵為師資間不可思議的因緣。親鸞圓寂後，其安覺信尼就就鸞墓創**本願寺**。室町幕府義政將軍時，本願寺第八世**兼壽**，號**蓮如上人**，盡力佈教，文明三年辛卯（明憲宗成化七年西元一四七一年）開道場於越前之吉崎，以平易的語言講解教義，廣佈於民間，故越前加賀諸國的信徒甚眾。甚曾孫**光佐**，號**顯如上人**，熊藉一向宗的雄厚勢力，遂有所謂「一向一揆」（一向宗徒的暴動）事件。織田信長先後遭遇比叡山暨一向宗徒的頑強抵抗，（元龜二年辛未西元一五七一年，信長追擊強敵朝倉淺井兩軍，兩軍遁入比叡山負固，山僧道為作掩護，信長大為恚憤，翌年（一五七二）九月十二舉兵襲比叡山，廟宇佛塔悉付一炬，並不問僧俗悉加殺戮。三年後（一五七四）又強襲伊弉長島的一向宗，僧徒被殺者達二萬眾。）**豐臣秀吉**亦感統治困難而煞費周章，（平秀吉於政治運用方面，非信長所能及。對佛教表示維護，一面收繳僧侶

之武器，一面則允許比叡山恢復舊觀。）德川家康對此則較有統治的經驗與嚴密的辦法。（家康主政後，善以法度為統制工具。初，豐臣秀吉制定高野山之法制。家康乃更詳定裁制全邦諸宗寺院之整個法度。此法度之概略，另見下文。）

智真，號**一遍上人**，承法然弟子證空的教系，別創**時宗**，（具稱六時往生宗，）為此宗開祖。以晝夜六時專修唐善導的往生禮讚為往生的業因，故名。證空尚有種種理論上的要求，一遍則無何等理說，唯有念佛。其語錄中之可述者，茲摘錄三段於下：『所謂三心——至誠心深心回向心——云者，忘身心而申念佛外，別無子細。棄其身心之姿，是為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經的一心不亂云者，只是求之名號的一心。若求之於名號之外，則可說是二心，不可云一心。』『不可於稱名之外求見佛，名號即為真實見佛，肉眼所見之佛非真佛。我等當時的眼中見佛，可稱為魔。』

日僧**日蓮**，為安房國（今千葉縣）一漁夫之子，十六歲薙髮出家，學於比叡，閱覽三藏，深達台宗玄旨。後遊歷諸方，又通諸家法門。嘗登山嶺對旭日高唱「妙法蓮華經」經題十遍，大會緇素。斥念佛參禪，極言：『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國賊。』著有「立正安國論」，誹謗諸宗，禍幾不測。（被幕府判處流刑，兩年後蒙赦返鎌倉。）元軍征日之役，日蓮又上書幕府，攻擊諸宗，又被流於佐渡。於是更著「開日鈔」「觀心本等鈔」諸書以教其弟子。遂為別創日蓮宗（亦稱法華宗）的開祖。年六十一歲圓寂。弟子結集其遺文一百四十八章（錄內），後集者二百五十九章（錄外）。此宗謂：因事理不二，一心唱「妙法蓮華經」經題，則一經所詮諸法實相之功德，自然圓融，即身成常寂光之妙果。又謂：天台傳教，弘迹門迹化之理的法華，我則弘本門本化之事的法華也。其說之怪誕不經謗毀諸宗者，多如此。現時寺門前豎立「妙法蓮華經」五字經題石者，皆為日蓮宗所遺留。

以上日本所別創的各宗，因為簡單易行，通俗普及，故為廣大民眾所極端歡迎，其在民間的勢力，至今仍形盛大。

天台宗僧**天海**，即日本第一部大藏經天海版的願主，為德川家康所信任，充政治顧問。其後，妙立、靈空、玄門，等學僧亦弘天台之學。五山禪宗僧**崇傳**，亦為德川家康所信任，任外交文文書，有黑衣宰相之稱。其後後。臨濟下的愚堂、古月、白隱，等名僧。曹洞下的月舟、卍山，等名僧，亦均研究宗學，盛極一時。

德川家康將軍時，明僧**隱元禪師**渡至日本，遂於臨濟曹洞兩家之外**開創禪宗新派的黃檗宗**。於是此時的禪宗，分成鼎足而三。其後，各派亦仍不免有自矜門戶之爭。隱元字隆琦，生於明之福州。（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壬辰西元一五九二夫。）六歲時，其父遠遊他方，音信不通；及長，思念其父，遍歷各地尋親。崇禎七年（西元一六三四年）皈依佛門，入福清縣黃檗山，嗣承費隱通容禪師之法統，為臨濟正傳第三十二世，時年四十三歲。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七年）如主黃檗席。隱元學高德重，能詩善琴，參學弟子常至數千人。日本長崎興福寺禪僧逸然聞其德風，懇請東渡，遂於承慶三年甲午（南明永曆八夫清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年六十三歲時率大眉獨湛性派三弟子到達長崎，遂止興福寺，學僧相踵入其門，名聲日盛。翌年乙未（南

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九月，以妙心寺僧龍溪宗潛之聘，到攝津之富田普門寺。萬治元年戊戌(南明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年)始出江戶謁將軍家綱，翌年(西元一六五九年)賜地於山城宇治建寺，寬文元年壬寅(南明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西元一六六二年)落成，號黃檗山萬福寺，隱元為第一世。後水尾天皇兩次敕問禪旨於隱元，賜品物甚多。後讓法席於木庵而退隱。延寶元年癸丑(清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年)四月三日圓寂，年八十二歲，賜諡大光普照國師。有隱元禪師語錄十六卷，為明僧海寧所編輯。

江戶幕府時代的真言宗，有古義新義兩派。古義派高野山，有學侶、行人、聖方·三支。新義派名僧輩山，議論叢生，遂致各派亦互相紛爭。曰蓮宗又產生「不受不施派」以抵抗幕府的政治壓迫。一向宗的跋扈，又如前述。於是江戶幕府乃有使諸宗各寺院悉裁制的整個法度之實施。

江戶幕府成立之初，一方面保護佛教並謀佛教的興隆，一方面則對諸宗寺院僧侶加以嚴厲的裁制。慶長十二年丁未(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西元一六〇七年)八月，對比叡山下法度七條，其後屢下法度於諸大寺。元和七年辛酉(明熹宗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年)又總合前數年所領的諸種法度而成為一種對諸宗諸大寺院的法度，此法度的精神則在保障秩序與獎勵學問。幕府之所以獎勵僧侶治學，亦為預防其干涉政治或妄攬俗務。又規定十九年乃至二十年為期，考核僧侶法學之有成績者，依法度晉升。於是僧侶悉循法度，而諸宗亦以日盛。

日本所收存的大藏經，皆先後分別取之於朝鮮與中國，各種版本都有。其自行雕刻印行的大藏經則始於六三二三卷的**天海版**(即寬永寺版亦稱倭藏開版年代為寬永十四年丁丑至慶安元年戊子明崇禎十年至南明永曆二年清順治五年西元一六三七——一六四八年)及六九五卷的**黃檗版**(即鐵眼版開版年代為寬文九年己酉至和元年辛酉清康熙八年至二十年西元一六六九年——一六八一年，)皆是江戶幕府時代所開始而且完成。

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幕府未造之「安政大獄」，(安政五年戊午清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八年)唯西鄉隆盛與**僧月照**，事先聞風遁走而得免於難。終於慶應三年丁卯(清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宣告皇政復古，廢止幕府將軍；翌年戊辰(西元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廢藩置縣，完成日本全邦的中央集權。

綜觀本文所記的日本佛教史料，奈良朝及平安朝的佛教，主在高深教理上發展；鎌倉幕府時期的佛教，一面高深，一面直捷，可說是各宗平衡發展；寶町幕府以迄江戶幕府時期的佛教，雖繼承以前諸宗的興隆，而已經主在通俗普及上發展。此等發展的演變，當然是歷史的關係。所謂時代的背境，社會的需求，以及大群眾的機緣，就是佛教隨時隨機相應方便的發展主因。自明治維新以後，迄於今茲，仍承上述三大時期的發展，繼續分道發揚。另一方面，則以科學與哲學發達的所得，增進了佛教整個思想體系的領解，不但是原有寺院中的高深研究或新創佛教大學中的專設佛學系或研究院即普通大學的哲學系中亦有佛學講座，其行持上縱或不免有慚古德，其學問上却是可能超越前人。明治以後日本大藏經的印行，有八五三四卷的**縮刷版**(亦稱弘教藏明治十三年庚辰至十八年乙酉清光緒六年至十一年西元一八八〇——一八八五〇年)六九九〇卷的**卍字版**(明治三十五年壬寅至三十八年乙巳清光緒二十

八年至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五年）七一四四卷的**卍字版續藏**（明治三十八年乙巳至大正元年壬子清光緒三十一年至中華民國元年西元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二年中國上海涵芬樓曾於民國十二年癸亥影印此本）九〇〇六卷的**大正藏**（大正十三年甲子至昭和三年戊辰中華民國十三年至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及**昭和再訂縮刷版**（昭和十年乙亥中華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為縮刷版校勘訂正後的影印本，卷數版式均相同。）最近，**日譯藏文大藏經**又已完成，正在印刷出版中。可見日本對於佛學的多方面研究，方興未艾，其朝野一致的精神殊屬可佩。返觀吾國佛教文化事業，在不久的將來，恐難免有蕩乎其後之感。

一玄曰：古來專門研究史學之諸大名家，莫不謂「史家須兼具學識才德」。苟非大才，不習史學，識不博大高超，而德不能持千秋萬代之平，則決不足以在歷史有所著筆。今此文所記，儘是斷簡零章雜集記錄之史料，原不足以言史，但為後之作佛教史者聊備一些資料而已。學識才德，非所繫也。雜記之文，且止於此。